

中国教堂建筑述略

徐好好

摘要: 尝试对中国教堂建筑史料做简单的归纳,对唐朝基督教传入中国 1300 多年以来教堂建筑的基本情况进行概述。19 世纪中叶以前的教堂建筑按时间顺序排列;19 世纪中叶以后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选择开埠比较早的沿海城市和内地重镇,按地域以建造时间为序介绍;当代教堂建筑则以温州、汕头和南京为例分析其特点。

关键词: 中国教堂建筑、唐景教、元也里可温、~~明~~、~~清~~、~~民国~~、~~当代~~

正当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在奥古斯都统治下繁荣昌盛,远东的东汉帝国兴旺之时,在西亚出现了一个新的宗教。当时无论奥古斯都或是汉朝皇帝都不知道这个宗教,但它注定是要改变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并使之传播到欧洲,而且到后来对中国和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公元一世纪中叶,基督教起源于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脱胎于犹太教,相传为犹太人耶稣所创立。他一生致力于布道,解救受罗马帝国统治的犹太人民。门徒们相信耶稣就是犹太传说中的弥塞亚^①,来拯救饱受战乱和奴役之苦的犹太人民,所以尊称他为基督,他所传达的道义被称为基督教。

在四个世纪以内,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盛行的国教^②。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基督教也在 1054 年分裂为罗马公教(即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即东正教)。16 世纪中叶,罗马公教内部发生了反对教皇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一些新教派陆续脱离了罗马公教,它们被通称为“新教”。所以基督教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教派的统称。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合称世界三大宗教,而基督教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全世界约有 20 亿基督教徒。

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基督教几乎涉及了人类所有文化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在欧洲,基督教的圣所——教堂,不仅是信徒集聚的场所,自教堂建筑产生以来,它们一直都综合着当时建筑学、建筑技术、结构、材料、施工、建筑装饰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教堂的雕刻、绘画,每一寸天花、地坪都蕴含着人类思考和信仰的印记,而且成为那个时代的杰出和不朽的表现;在中国,从历史上看,基督教曾四度试图进入中国,可是

^① 弥塞亚(Messiah)源于希伯来文 mashiah,原意为“受膏者”或是“受到上帝祝福的人”。古代以色列人国王即位的时候,大祭司要代表上帝在国王的前额上敷涂橄榄油,表示上帝的祝福,国王就成为受膏者——弥塞亚。以色列人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日夜祈求上帝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他们的民族和国家,重建以色列王国。参见文献[8], 15 页

^② 公元 380 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下令,废除基督教外一切教派活动,赋予罗马主教很高的宗教权力,并且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惟一宗教。

每一次都被驱逐出中国国门,冲突碰撞的直接结果就是教堂建筑的捣毁和重建,虽然基督教每一次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努力都没有维持很久,以至于我们无法了解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几乎所有探讨中国近代建筑“洋化”的起源都绕不开一个结果——那些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基督教教堂建筑带给中国的影响。

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深化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根基,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穆斯林,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从西方世界传入的基督教和教堂建筑在中国的沿革、发展,以它们特殊的影响力,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探讨教堂建筑在中国的来龙去脉,了解中国教堂建筑盛衰发展演变的过程,可以对中西方各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合、借鉴有更深层的理解。

一 唐朝的景教与景教寺

1. 景教的传入与东方教会

(1) 古代东方教会和聂斯脱利教派

早期基督教产生后不久,由于罗马入侵耶路撒冷,部分基督教徒东迁,逐渐形成了基督教东西教会^①。

公元5世纪初,基督教会中关于基督耶稣神性和人性的争论愈演愈烈。公元431以弗所会后,以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us)所倡导教义而得名的聂斯脱利教派被西部教会判为异端,聂派信徒遭到了排挤和迫害,只有逃往中亚和远东发展^②。

公元498年,聂斯脱利派信徒正式与罗马教会决裂,以波斯首都塞流西亚(Seleucia)和重镇克泰锡封(Ctesiphon)为东方大主教总部,传教活动从美索不达米亚一直东至中国海,揭开了古老东方教会在中亚和远东长达500年的全盛时期。

(2) 聂斯脱利教派传入中国

公元7世纪以前,中国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和中亚、西亚及罗马帝国有了经济和文化往来。在这期间,虽然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关于早期基督教已传入中国的说法^③,历史学家陈垣在《基督教入华史略》一文中认为:潞口某学院出版《路德改教始末》有后汉马援征交趾时,基督教已入中国之说。北京天主教某主教著《燕京开教略》有“三国时关云长奉基督教”之说。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找到相关性的有力根据,不能叫人相信。一直到1625年,明朝熹宗天启五年在西安市西郊出土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图1),才证实了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教士到中国的确凿时间是635年,即唐贞观九年。

中国历史到了唐朝,国势强盛,疆域空前扩大,声誉远及海外。西域波斯、东罗马拜占

^① 公元70年,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被罗马侵占,基督教中心东移至叙利亚首都安提阿(Antioch),并继续扩展到安提阿以东160英里的城市爱迪沙(Edessa,今Urfa)成为古老东方教会的中心。

^② 参见文献[8],60~64页

^③ 传说,6世纪初传教士曾用传教用的竹制手杖藏匿蛋卵,偷运回波斯和欧洲。另外还有使徒多马(Thomas)在北京布道的传说。罗马作家阿诺比尤斯(Arnobius)在公元300年左右也曾提到过传教工作已经遍及赛里斯(Seres,丝国,指中国)。不过这些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说法都没有很确凿的证据,至少在中国的史书上没有记载。当然也就没有基督教建筑传人的相关佐证了。

庭帝国在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就与中国通使。丝绸之路贸易繁盛,商人、使臣络绎不绝。国都长安(今西安)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东方最繁华的国际都市。

唐太宗李世民对外来文化采取宽容的方针,除道教佛教,外来的宗教也一视同仁。由于听闻中国开明的宗教政策,635年(贞观九年)来自波斯的聂斯脱利派主教阿罗本到达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唐太宗不但派出宰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长安西郊隆重接待,而且还邀请阿罗本到皇帝的藏书楼翻译圣经,到皇帝的内室讨论福音的道理。唐太宗认为这种道理对维护自己皇权统治无害,“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三年后,下诏书允许传教。并由政府出资在长安义宁坊建造景教寺一所^①。

聂斯脱利传入中国以后被称为景教,意思为光明正大的教派,这可能是他们长久以来受罗马教廷压迫的一种反抗和宣泄吧。



图1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引自文献[4],22页)

2. 景教建筑在唐代的兴盛

(1) 景教与在中国的第一座基督教堂

唐太宗以后,历代皇帝对宗教政策都比较开明,景教得到了平稳而持续的发展。

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来自波斯的叙利亚人景净作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镌刻成石碑,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介绍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记叙了自景教传入中国的150年间,受到唐朝六位皇帝礼遇的经过。

碑文说,李世民在接触了阿罗本和他翻译的基督教经义后,给了景教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基督教义深奥,基本道理完备扼要,说理的词句也不繁琐,讲出来的道理好比是得鱼忘筌,对人做事情都很有好处,应该让天下的人都知道。

于是就让建筑司在长安城义宁坊建造了一所大秦寺,让21名景教的传教士居住布道^②。

这就是中国官方记载的第一座中国基督教堂。

碑文中还提到,有关部门派画师将皇帝的肖像摹画在大秦寺的墙壁上,五彩的画像让寺堂生辉^③。

中国的第一座基督教堂的形制已经没有记载了,但是从碑文中,可以知道它内部金碧

^① 北宋王溥编《唐会要》四十九卷记载:贞观12年7月唐太宗下诏书,“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放设教,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密济群生,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参见文献[4],22页

^② 碑文曰:“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于是‘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参见文献[4],44页

^③ 碑文曰:“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参见文献[4],44页

辉煌的彩画装饰,中国的皇帝也在这里与十字架文化进行了一次划时代的精神交汇。

(2) 从景教碑看景教建筑在唐代的兴盛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一文中说:高宗皇帝在各州设立景教寺,尊称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景教的教义流传各省,国家安定富裕,全国各地都有景教寺,家家都可以享受到景教的福音^①。

是不是真的“寺满百城”,并且到了家家都享受景教福音的境地,由于缺乏历史资料,已经没有其他佐证了。但是可以想象的是,景教的发展已经有相当的规模,而且景教寺的设立也一定是很普遍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8世纪前后,西方教堂处于早期基督教地下墓窟时期向后世基督教教堂转变过程中,教堂小而朴素,类似当地的民居,并且有墓地环绕,表达的是基督教对死亡的思考,给伟大而神圣的殉教者的荣誉。

相比之下,唐高宗时期,基督教在中国境内与道教、佛教、摩尼教、火祆教、回纥教并行,传教场所各地林立,甚至达到了“寺满百城”的程度,真的让人惊叹不已了。

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当政。由于她的登基得到了佛教徒的支持,所以佛教得以兴盛,而景教等外来宗教受到了排挤。碑文对此略略带过。

从唐中宗、唐睿宗复位,至唐玄宗李隆基登位,景教重新兴盛。碑文说:玄宗皇帝诏令宁国公等五位王公到景教寺去设立基督教仪式的神坛,以往弯折的教堂栋梁立得更高,一时倾倒的教堂基石也得以扶正^②。

这个时候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教堂已经很有点西域教堂的味道了,因为它已经具备了基督教堂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神坛。西方基督教堂的祭台在精神上统领着教堂,用石棺或者是盖棺板作为教堂灵魂的基石。凭借神坛的设立,中国基督教堂实现了与西方基督教堂精神上的步调一致。

公元742年,唐玄宗命内侍大将军高力士送来以往五位皇帝的画像安放寺内。744年,唐玄宗又亲自为景教寺题匾额和题词,宝贵的装饰使教堂光彩夺目^③。

可以想象,这所建在长安的教堂一定气势不凡,起码在装修等级上已经到了国家的一流水平。

历史学家陈垣在《基督教入华史略》一文中曾提到:在宋人注杜甫《石笋行》中,有成都大秦寺以珍珠为帘之语。因此可知,当时景教在中国立足得很好。

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领导了著名的“开元盛世”。他和他的儿子代宗李豫、孙子德宗李适都对景教有好感,保护和支撑着景教的发展^④。

① 碑文曰:“高宗大帝克恭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夺满百城,家殷景福。”参见文献[4],45页

② 碑文曰:“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公,亲临福寺,建立坛场。法栋暂桡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参见文献[4],45页

③ 碑文曰:“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于是天题导榜,额载龙书。宝装瑞翠,灼烁丹雘。”参见文献[4],46页

④ 碑文曰:“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闢九畴以惟新景命。”参见文献[4],46页

有了皇帝的支持,各地景教事业又复兴起来。碑文提到:“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廊宇,如辉斯飞。”就是说,当时破旧的景寺得到修复,面积小的教堂加以扩充。每座教堂都隆重地装饰走廊屋宇。屋檐之角就像五彩的奇禽展翅在飞翔。从这里推测当时的教堂建筑可能形制上类似唐风建筑,有大屋顶或者可能有重檐,有廊道连接建筑。碑文还一再提到了“建寺”、“筑精宇”、“和宫敞朗,遍满中土”。还可以得知当时的教堂不仅建得多,而且十分讲究、精美无比。无论景教寺形制是否是中国式建筑,但从出土的“大秦景教碑”的碑额上就雕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及碑文中提及的“建立坛场”,可得知西域基督教教堂的基本元素还是被原汁原味的保留。

(3) 从其他文献看景教建筑在唐代的兴盛

北宋的学者王溥编撰了一部《唐会要》,书中第四十九卷记录了唐太宗在638年7月发的一封诏书,说从波斯来的阿罗本主教带着《圣经》和圣像远道而来,他所传授的基督教教义深奥“无为”,对人对事都有好处,应该让它推行天下,有关部门在长安的义宁坊修一座礼拜堂,安置21名传教士。

唐玄宗当皇帝的时候,给景教寺题了新的寺名,这可是一件大事:原来建在义宁坊的景教寺叫做波斯寺,宋代学者宋敏编著的《长安志》第十卷证实了“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这一说法。

745年(天宝四年)9月,唐玄宗颁布了一纸诏书,说从波斯传来的基督教,原来是源自大秦(罗马)国,在中国已经广为流传了很长时间,当初建寺的时候,因为是从波斯传教进来,所以就起名叫波斯寺,但是传教就是要把教义的本质告诉大家,所以追根溯源,要把长安和洛阳两地的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其他地方的礼拜堂,也可以改名叫大秦寺^①。

这一些官方文件,都是景教教堂在中国兴盛的证据。不难看出,由于唐朝前期的国势强盛,政策开明,基督教这一种外来宗教不仅平稳地度过了最初面对人们惊异而略带不信任眼光的时期,而且随着开元盛世,景教建筑也进入了它在唐朝的全盛年代。

3. 景教建筑的消亡

(1) 唐代后期的禁教政策和景教建筑的消亡

唐德宗以后,景教与步履蹒跚的唐帝国一样,渐渐进入了衰落时期。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代皇帝,发展缓慢。唐穆宗的时候,学者舒元舆写了一篇《重岩寺碑序》(参看《唐全文》第727卷),说大秦景教、波斯摩尼教、火祆教的寺庙加在一起还不够一个小邑中佛教寺庙的数量多。这与唐高宗时期光是景教就可以“寺满百城”的景况相比,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① 北宋王溥编《唐会要》四十九卷记载:745年,天宝四年,玄宗颁布诏书:“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旧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得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这里的两京指长安和洛阳。

845年(会昌五年)8月,唐武宗诏令全国禁教^①(参看《旧唐书·本纪》第18上)。景教遭遇了自传入中国210年间最大的劫难。教徒被遣返被勒令还俗,教堂被毁。

33年以后,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有十二万回教徒、犹太人、火祆教徒和景教徒被杀^②。从此,景教在中原绝迹。景教建筑也随之灰飞烟灭,只剩下残垣断壁写成的一串串省略号。

(2) 各种文献看唐代景教建筑的衰亡

唐武宗在禁教令里说,现在各种教派的信徒越来越多,寺庙越盖越高,耗尽了人力财力。

虽然皇帝指的主要是佛教,但是可以从这条禁令里看出,在受冲击之前,寺庙的规模可能是很壮观的,这当然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景教礼拜堂。

其实在禁令下达以前,那一年的七月份,掌管中央行政大权的中书,门下两个部门联合上奏,说佛教已经被革除了,那景教和火祆教的教堂也不能保留^③。这两条命令一下,《新唐书·食货志》说,845年皇上下了禁教令以后,全国已经毁了四千六百多座大的寺庙,四万多所小的寺庙,其中包括了大秦景教和波斯祆教^④。

再加上878年黄巢起义那一次战火的冲击,到了五代十国和北宋的时候,景教在中原已经没有什么痕迹了。

一百多年以后,980年,聂斯脱利教派的大主教派了六名传教士来中国联络教会。7年后,这六名传教士回总部汇报,说中国的基督教已经不存在了,教徒都被杀了,教堂也被毁坏了,不可能再进行传教活动了。

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子由游历了南山的大秦寺,题了诗。苏东坡说,一马平川走到头,见到一片郁郁葱葱的山麓,突然发现山间隐现着孤塔,影影子吊地对着山上的乱石^⑤。苏子由说,哎呀山地都削平种麦子了,连那些教徒也麻木无奈得很,根本就不去探索什么教义了^⑥。

可以证实,唐太宗在周至建的另一座大秦寺也荒废了,这和传教士的汇报是相吻合的。

后来又有一个金代的诗人杨云翼,游历了同一所大秦寺,写诗说,寺院已经废弃了,只留着基础,教徒们都不见了,任凭地荒废在那里。到处长满了青苔,瓦也没有什么光泽了,

① 唐朝佛道两教盛行,尤其是佛教,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社会基础。景教等西域传来的宗教被当时的人看做是外道,或者就被误解为是佛教的变种。景教碑中虽然提到传教士们建立了景教寺,但是并没有提到他们在普通民众中接纳信徒的情况,他们对中国人传教的范围主要是接触的贵族和皇室成员,一旦中国的皇帝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的时候,它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② 阿拉伯作家阿布在扎德(Abu Zayd)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东游记》,说878年,唐僖宗乾符五年,十二万回教徒、犹太人、火祆教徒和景教徒在黄巢起义军攻打广州的战役中遇难。原文引自文献[1],54页;转引自文献[4],28页

③ 会昌5年7月,中书门下条奏:“其大秦、摩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遣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转引自文献[4],25页

④ 《新唐书·食货志》:“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招提、兰若指较小的寺庙。转引自文献[4],25页

⑤ 苏东坡诗云:“见荡平川尽,披陀崔嵬横。忽逢孤塔回,独向乱山明。”引自文献[4],26页

⑥ 苏子由诗云:“山平堪种麦,僧鲁不求禅。”引自文献[4],26页

只剩下一座塔楼,掩映在山间^①。

这些旁证明确地说明:公元12世纪,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消失。

不过无论如何,代表着早期基督教的教堂在中国仍然有着第一次长达210年的荣耀,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重要的一笔。

二 元代的也里可温与十字寺

1. “也里可温”的由来

公元9世纪,唐武宗下令禁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在中国的分支“景教”遭遇了自7世纪传入中国后最大的灾祸。

由于唐朝信奉景教的人多为西域各国的商人和少数皇帝贵族,景教的信徒也多为波斯人和叙利亚人,所以大部分信徒南下,渡海去了印度。也有部分信徒沿景教传入的原途返回,与停留在中国边境少数民族部落的景教徒汇合。

所以,自唐后数百年间,基督教在中国西部地区并未完全绝迹。

“也里可温”是元朝时候蒙古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在元代以前,历朝历代的史书文献上都没有提到过“也里可温”这个词,而自《元史》开始,元代各种文件开始使用“也里可温”,并把也里可温和木速蛮(Mussulman,即回教徒),答失蛮(波斯称回教僧侣为Danishment),儒,道,僧并列提及^②。

1294年,天主教传入中国,所以元代把原先的景教徒和后来的天主教徒都称为也里可温,称他们都是信奉耶稣和十字架的。

2. 景教的再现和景教建筑的复兴

(1) 景教的再现

唐武宗以后,景教传播和发展的痕迹,有史可考的,存于蒙古的一些部落当中。

外蒙古的克烈部落是信奉景教的部落,这中间出现了好几位很有名的景教徒。包括部落领袖王罕,王罕的侄女唆鲁忽贴尼(Sorhahahtani),她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Beatrice),还有她的侄女托古思可敦(Dokuz Khatun),是元定宗贵由的母亲,他们都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信徒^③。

内蒙古的汪古(Ongut)部落也崇奉景教,根据《元史》中的记载,部落领袖的驸马高唐王阔里吉思,元朝著名学者马祖常和赵世炎,都是景教教徒。

(2) 从“镇江大兴国寺记”看元代景教教堂建筑

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景教出了一个名人叫马薛里吉思(Mar Sarqis)。他原来在波斯东北行医,是一个聂派教徒,后来到中国。1278年,忽必烈任命他为镇江府知府。他在

^① 杨云翼诗云: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绿苔昏碧瓦,白塔映青山。引自文献[4],27页

^② 参见文献[4],95页

^③ 引自文献[4],97页

任的三年里,修了几所教堂,并开始布道传教^①。

这是中国本土第二次基督教建筑浪潮开始的重要标志。

元代至顺所《镇江志》第九卷《镇江大兴国寺记》中记载^②,大兴国寺在夹道巷,是至元十八年,本地的知府马薛里吉思所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当上了知府以后,仍然严格地遵守着教规,立志推广教法,并决定辞官建教堂。丞相认为他为公事操劳,忠于皇帝,善待百姓,所以很支持他盖礼物寺。于是皇上拨了地,赏赐了农田六十四顷,让他专心建教堂,同时还继续任镇江知府。

马薛里吉思一共盖了七座教堂,镇江四所,大兴国寺、云山寺、聚明山寺、甘泉等,丹徒县开沙一所四瀆安寺,黄山一所高安寺,还有杭州荐桥门一所大普兴寺。

《镇江大兴国寺记》提到镇江的大兴国寺是“舍宅”兴建的,也就是说,大兴国寺可能并不具备西域教堂的样式,它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中国化的礼拜堂。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通过转述马薛里吉思的介绍,描述了撒马尔干一座基督教堂的形制,这座教堂内大厅有四根木制束柱支撑,每根有四十尺的高度,其中有一根立柱不知为什么还悬了一尺多。根据陈垣先生的考证:记中所谓“一柱悬空尺余”者,有故事一段,足资印证。《马可游记》第五十一章曰:撒麻耳干,大城也。……城中有一异事,数年前国王曰察哈台,蒙古大可汗胞弟也。王奉基督教,教徒势力倍增。建一寺,寺顶为圆形,中支一柱,柱下盘石,系教徒请于王,得之于某回教寺中者。时回教人以王右基督而左同,不敢与争。察哈台死,继其位者,非基督徒,回人因得于王,索还奠柱之石。基督徒许酬以金,回教徒不允。基督徒无术,乃哭诉于施洗约翰之灵。至约定移石之日,柱忽自起,离石可三掌,石移去后,柱仍悬空际,至今犹然云。此即梁相记中“一柱悬空尺余”之说也^③。

这座教堂还有可能安葬了总主教马耶里亚(Mar Eijah)的灵柩,是撒马尔干一座重要的基督教堂^④。

这一段文字是中国史书对西域教堂比较早期的叙述。在这之前的历史文献,包括与西域外交活动相当频繁的唐朝,也没有在正式的官方书上出现过对西域教堂的介绍。

关于“舍宅”所建教堂一说,还有不同的说法,据历史学家陈垣在《元也里可温教考》中说:镇江十字寺建成27年后就被崇尚佛教的仁宗皇帝下诏拆毁。赵孟頫奉敕撰碑,其略曰:……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毁拆十字,命前画塑白塔寺工刘高,往改作寺殿屋壁佛菩萨天龙图像,官具给需用物,以还金山。……金山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下院。据此碑则当时所毁拆者,只是寺顶十字及寺内塑像,并未将寺址彻底拆毁,也说明当时十字寺形制是中国传统庙宇式的^⑤。

所以可以推测,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中原本土至少已经从思想上开始接受异邦教堂

① 引自文献[4],109页

② 引自文献[4],129,130页

③ 参见文献[2],42页

④ 参见文献[4],110页

⑤ 参见文献[2],32页

的进入了。

(3) 从其他史料看元代景教建筑

据历史学家陈垣对元也里可温教的考证,元朝政府对也里可温建教堂很支持,《元典章》:有御位下彻彻都苦思丁骑马四匹,前来扬州也里可温十字寺降御香,赐与功德国段疋清酒等。

《元史·顺帝纪》卷三十八:后至元元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

甘州路之有十字寺,《马可游记》中说,“……其地之基督教徒,于城中建大礼拜寺三所云。”

《元史·顺帝本纪》中记载,公元1264年3月,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去世,由于她信奉景教,所以肖像保存在甘肃甘州路的“十字寺”内^①。

《元史·百官》中记载,公元1289年,忽必烈设置崇福司,对信奉耶稣的基督教徒,基督教神职人员,“十字寺”和基督教的仪式活动进行统一管理。

这里提到的“十字寺”,以及前面所说在《镇江大兴国寺记》中提到的撒马尔干“十字寺”,都是指基督教堂。

此外,由于蒙古人地处西域,加上多年征战,所以和中亚西亚民族有密切的关系。蒙古军队中有外国的雇佣军,蒙古贵族有外国侍卫,他们大都信奉基督教。

1275年,元都汗八里设立了景教总主教驻所(Metropolitau See)。1330年,亚洲西部索尔坦尼亚(Soltania)的总主教(Archbishop)说,中国北部(Cathy)有3万多景教徒,而且生活很富裕,建了很漂亮的教堂,教堂内陈设有敬拜上帝和先圣的十字架与肖像^②。

西方学者所著的《罗马的衰落与覆灭》第二章中还介绍在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帝国都城和林有一所景教寺,供销信奉景教的蒙古贵族官员和色目人做礼拜用^③。

3. 天主教的传入与天主教堂的出现

(1) 天主教的传入

蒙古族是中国历史上西征版图最大的一个民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继任者窝阔台率蒙古铁骑先后攻陷俄罗斯、波兰、德意志、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整个欧洲为之震惊。

1245年,罗马教廷在法国里昂召开欧洲主教会议,决定派出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John de Plano Carpini)等三人出使蒙古首都和林,利用一些蒙古贵族信奉基督教的环境优势,争取说服大汗信教,从而停止继续进犯欧洲。

数年后,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法王路易九世派方济各会修士罗伯鲁(William of Rubruck)和克来莫那(Bartholomen of Gremona)前往和林联络蒙古大汗。

这两批传教士都没有抵达中国本土,但他们都是天主教中国传教士中的先驱。

1260年,意大利传奇旅行家马克·波罗的父亲尼古拉(Nicolo)和叔父玛斐(Maffeo)

① 参见文献[2],30页

② 参见文献[4],98页

③ 参见文献[3],1214页

在波斯巧遇蒙古使团,被邀回国晋见大汗。元世祖忽必烈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并请他们带信给罗马教皇,邀请传教士来华。

1275年,马克·波罗与父亲、叔父带着教皇的复信再度来华,并长居于此处近二十年。

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命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高维诺(Sohn of Montecorvino, 1274—1328)任教廷使节来华传教。经亚美尼亚、波斯、印度,由海路进入中国。

1294年,孟高维诺抵达北京,被准许在中国自由传教并建设天主教堂。天主教开始传入中国。

(2) 从马可·波罗《游记》看中国的教堂建筑

马可·波罗的那本“世界奇书”《游记》中,记载了公元13世纪聂斯脱利教派在中国的情况^①。在甘肃甘州发现了一所华丽教堂,蒙古阿拉善有“很好的教堂”,直隶河间府有一座教堂,在镇江府发现了马萨里吉思盖的两座教堂,以及杭州府马氏修的教堂大普兴寺。

马可·波罗曾在扬州府任总管3年,《游记》中并没有提到该地有基督教徒的存在。但是在他离开中国35年后,修士和德理(Odorie of Pordenore)发现扬州府有3座聂斯脱利派的教堂。

马可·波罗也曾经造访过西安府,但是那里没有基督徒。这可以证实元代的景教与唐代的景教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3) 从孟高维诺的书信看天主教建筑

1294年,传教士高维诺抵达北京。虽然元世祖忽必烈去世,但是朝廷仍然热情而友好地接待了他,准许他在中国自由传教,直到1328年他在北京去世。

期间,孟高维诺留下了两封极其重要的书信^②。1305年1月8日,孟高维诺从北京寄出信函一封^③,信中写到:“我在京城汗八里(Cambaliche)盖了一座教堂,六年前已经竣工了,现在又扩建了一座钟楼,摆放了三座钟……受洗者达六千人。”

基督教建筑的钟塔是在早期基督教墓窟时期向中世纪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原形并不是来自罗马,现代人推测,它可能是吸收了日耳曼人瞭望塔的形象。

宋代诗人苏东坡、苏子由和金代诗人杨云翼在游历了唐代景教南山大秦寺遗迹后,都在诗中提到了“塔”。不过从诗文来看,他们并没有提到这个大秦寺与其他的佛寺有什么不同,所以可以推测唐朝时景教教堂的“塔”还是很中国化的塔。

而在孟高维诺信中提到的塔楼,已经明确为“钟楼”,从名称上和用途上已经和西方基督教堂的钟楼相吻合,并且钟楼能“置放三钟”,可以想象出其规模形制一定不会很小。

信中说,因为聂斯脱利派的教徒曾经诽谤过我,高唐王(汪古部落领袖阔里吉思)认定这些人品行不端,所以就率领他的臣民来信奉天主教捐资盖了一所教堂,非常雄伟宏大,简直像宫殿一样。我在礼拜堂内供奉了天主、基督耶稣和教皇的圣像,高唐王给教堂题名为“罗马教堂”。

① 参见文献[4],118页

② 参见文献[5],218~222页

③ 参见文献[6],43~51

基督教是没有偶像崇拜的。但唐代朝廷要求在景教教堂内供奉皇上的画像,传教士也接受了,是聂派基督教借以传教的一种策略。而元代所建的天主教堂,从内部形制的规范上,与当时罗马教堂已经比较接近了。

这封信还提到他正在修建第二座教堂,以便安置收养“皆加洗礼”的150名儿童。这时候,传入中国的天主教已经出现了洗礼及唱诗等仪式,可以推测教堂里的建筑空间及内部设置已经完善,以便进行宗教活动。同时由于孟高维诺和他的助手以及唱诗班的儿童都住在教堂里,并要进行缮写圣经的工作,所以与教堂连接,而且比较专业的神职人员办公室和宿舍也应该有妥善的设计安排。

1306年2月,孟高维诺从北京再次寄出一封书信^①,信中说:“去年我在大汗皇宫门前又盖了一座新教堂,和皇宫只相隔了一条街,不到一箭之地。”教堂已经盖到皇宫门前的了,这不能不说是元朝教堂建筑兴盛的标志之一。

“新教堂的地基是鲁喀龙哥(Lucalongo)的商人彼得(peter)买来捐给我的,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希望我能盖起教堂,礼敬天主。……各方的朋友慷慨解囊相助,新教堂得以在圣方济名(St. Francis)祭日竣工。马厩、草舍、房屋、厅堂、庭落,建筑非常完备。会堂可容纳200人。教堂四周有围墙围合。……因为冬天快到了,还有一些工程没结束,木料全储备在教堂里,等待来年使用。城内、郊外许多从没有见过教堂的人们,都赶来见一见这种在高耸的屋顶上架有红十字架的教堂建筑。当他们远远地站在围墙外又听见我在室内宏亮的歌声时,感到万分惊讶。而且我们的唱诗班所唱赞美诗歌声连皇帝陛下在他的宫殿里居然也能听到。这件事使那些没有信奉基督教的人们感到震惊而奔走相告。这一所教堂和我以前盖的那一座都在京城里,两者距离大约2.5英里,我认为在京城里是找不到可以和它们比拟的建筑。”

可以从这段叙述中了解到几个很重要的信息:

① 详细记载中国基督教堂建筑十字架高立屋顶,这在史料上是很早的一次。唐史,包括元史,均只提及“十字寺”,而没有指明十字架已成为室外建筑的组成部件。

② 元代来中国的传教士们不仅只是传道诵经,宣传他们的信仰,同时还刻意地把他们国家的教堂建筑也引进了中国本土。

③ 新盖的教堂已经与中国传统庙宇建筑拉开距离,无论在形制式样,结构功能上都与西域的教堂更接近。以致教堂还没有全建好,就吸引了很多人去观看,并且对传教士们在教堂内唱赞美诗,建筑空间所产生的共鸣,讶异万分,不知什么东西。

所以可以想象,当汗八里的居民见到了这样一座闻所未闻的天主教堂时,真的是“四方传告”了。

(4) 从安德鲁的书信看天主教建筑

由于孟高维诺在北京传道成功,1307年,罗马教皇格勒门五世决定设立中国教区,

由汗八里主教统领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基督教活动。孟高维诺就任北京总主教,传教士哲拉德(Gerard),裴莱格林(Peregrine of Castello)和安德鲁(Andrew of Perigia)先后到达中国,就任泉州主教。

^① 参见文献[6],51~58

1326年1月安德鲁从泉州发出一封书信,它成为了解当时中国南方基督教建筑的重要史料^①。

信中说:“靠近大海的地方有一座很大的港口城市,波斯人称它为刺桐港(Zayton即泉州)。

有一位亚美尼亚(Armenia)的贵妇人在这里建了一所教堂,雄伟华丽,在这里首屈一指……她还捐了巨资维护教堂……哲拉德是这一座中教堂的第一位主持。死后,也葬于此……我到了刺桐以后,在附近的小树林里盖了一座美丽的教堂,距离刺桐城仅仅四分之一英里。教堂有办公室,足够22个神职人员用了,还有四间屋子,是高级别神职人员用的……皇上给了很多俸金,大半我都用来盖教堂了,在我住的地方,各种教堂寺庙,论起华丽舒适来,我建的教堂恐怕是最好的吧。”

安德鲁对他的林中堂还是颇为自得的。而且从他叙述中频频使用了“华丽”、“美丽”这样的词语来看,泉州的两座基督教堂建筑的外观一定采用了富丽的装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装饰的等级是相当高的。

(5) 从《大可汗国记》和其他文献看天主教建筑

驻波斯国孙丹尼亚城(Sohania)的总主教约翰柯林(John of Cora)在1330年写了一部《大可汗国记》^②,记载“孟高维诺总主教在汗八里盖了三座教堂,各相距二十里,又在刺桐城建了两座教堂。”“大汗对信奉基督教的教徒很厚待,……教徒请求皇上供给教堂、十字架和圣殿礼拜堂来祭祀基督耶稣,皇上从来都欣然答应。”

《大可汗国记》还记载了天主教建筑在传播初期受到景教徒破坏的史实,“总主教约翰·孟高维诺在京城里盖天主教堂的时候,聂斯脱利教派的信徒就晚上去捣乱,拼命妨碍他建设。”这和孟高维诺自己书信中提到受聂派教徒诬陷的事情是一致的。

而聂派自己的教堂“因为财力雄厚……所以整齐华丽,供奉了十字架、耶稣和古代圣贤先哲。”

1338年,教皇本笃十二世(Beuedict X II)派方济各会修士马黎诺里(John of Marignolli)作为教廷专使前往北京。

在他后来的记载中说:“都城汗八里内有方济各会修士的一座教堂,靠近皇宫,教堂里有总教主的寓所,并配有警世钟^③。”1346年他过泉州时,见到了3座天主教堂。而20多年前,1324年另一位传教士和德里(Odoric of Pordenone)只看到了两座教堂,发展之快,令人侧目。

据其他考古研究,1919年河北房山县发现古十字寺的遗址,有元顺帝敕赐十字碑记,碑上有古叙利亚文。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五块有十字的石碑。1890年张家口西北石柱梁发现三块景教十字碑墓石。新疆、蒙古中部和东部有几个义冢里有十字形的墓碑,这些都是12、13、14世纪的遗物。北京西南和里有十字寺,发现两块刻花的石碑:一块是

^① 参见文献[6],71~75

^② 参见文献[6],89~103

^③ 参见文献[5],252页

960年立的,另一块是1365年1月23日立^①。

从史料上来看,元代教堂建筑确实有过一段风光的历史。遗憾的是能留到现在的建筑实物、图片很难见到了。但是看现存的中国沿海伊斯兰教三大古寺建筑,或许会有点参考启示。泉州怀圣寺建于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第一次重修于1350年(元顺帝至正十年);杭州真教寺始建于1281到1320年之间;广州怀圣寺始建年代虽说法不一,但据史料记载,其寺中光塔塔顶原置一金鸡,随风旋转,以测风向,早在1392年7月(明洪武二十五年)就被台风吹落。想必此寺建造时间也在这以前(龙庆忠先生认为该寺建于唐代)。

从照片上我们看到泉州圣友寺寺门门楣作尖拱形。广州怀圣寺塔顶宣礼楼为典型的伊斯兰尖塔圆顶式。杭州真教寺,今仅完整保有的大殿,顶亦作穹窿式。

回过头来再读一读元代传教士们书信中所描绘的教堂,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测:由于当时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但各种宗教能进入中国交流,连他们的宗教建筑也能以与中国本土传统建筑异样的另类建筑形态在中国各地出现。

基督教教堂建筑在元朝时出现了复兴,并随着元朝被明朝取代,延续了大约60年之后,由盛期而消亡。景教再度销声匿迹,而天主教传入中国的首次尝试也宣告中止。中国基督教建筑又出现了数百年的真空时代。

三 明末、清初的教堂建筑

1. 明代末年天主教的重新传入和教堂的复兴

1514年,葡萄牙船只第一次游弋在中国南海海域,五十三年后,1567年,葡萄牙人正式获准在澳门定居,这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始。

1582年,明万历十年,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奉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Alexandre Valignani)的要求抵达澳门。

翌年9月,利玛窦与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进入肇庆,他们向当地知府申请建造一所教堂,侍奉天主,开始在中国南方传教。

1601年,利玛窦抵达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明神宗,并获准留居北京,传播西学和天主教教义。

自14世纪蒙古人退出关外以后,基督教在中国本土绝迹200多年。而现在利玛窦的来华,揭开了天主教第二次向中国传教的序幕。

2. 明代末年的天主教建筑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建造了一座教堂,一开始叫做仙花寺,后来把寺字改为“堂”,教外的人把它称为教堂,或者是天主堂。罗明坚帮助他一起修建了这座教堂,一同传教。

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Lazaro Catlaueo)开始在韶州、南

^① 参见文献[4],127页

昌、北京、南京等地传教。万历二十四年，在广西传教时遇到了上京赶考的徐光启，从而开始了两人终生的友谊。

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利玛窦在南京今中山门外四方城建立了南京第一座天主教礼拜堂。

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在北京宣武门建了一所经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北京南堂前身。

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回家乡为父亲奔丧，路过南京时便邀请郭居静到上海传教，在徐氏家宅的西侧盖了一所教堂。这是徐家汇第一座教堂。

1621年，明天启七年，学者孙元化到杭州，邀请郭居静，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到嘉定传教，盖了一座教堂，还有十几间教士住所。

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传教士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在江南传教，抵达上海，购买了上海城内安仁里潘姓人家的世春堂，改建为教堂，后来人把它叫做“老天主堂”。

明末时期，虽然有传教士和信奉、推崇天主教的本土学者尽心尽力地推广，但是明朝颓势已成，明王朝的覆灭也已经不远了。

不过由于上述教堂并没有像前朝那样与政治发生太大的牵连，所以改朝换代的时候倒也安然得留下来。

3. 清代初年的天主教建筑

(1) 汤若望和北京南堂

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明末时候已经到了中国。清兵入关以后，顺治二年(1645年)，皇帝召他到北京管理天文仪器，开始在北京地区传教。

1650年，清顺治七年，皇上给他一千两黄金作赏赐，允许他在北京宣武门盖一座教堂。明末，利玛窦在宣武门善书院内建过一座经堂，汤若望就在经堂的旧址上改建，修筑了更雄伟的天主堂，题名为“无玷始胎圣母堂”。

据史料记载，初建时除了大礼拜堂这外，还修建了天文台、藏书馆、仪器室和教士住宅^①。汤若望自明朝来中国后，先是继任学者邓玉函(Jean Terrenz)作了明朝的天文历官，后来又做清朝顺治年间的钦天监正(天象历法部门长官)，他又始终坚持推广利玛窦科学与神学并行的传教方式。所以在教堂内修建天文台、仪器库是合情合理的。

1662年，宣武门内天主教堂落成，顺治皇帝赐给“钦崇天道”的额匾。“这一座西洋风格的建筑物在北京城内十分引人注目。”^②

因为后来北京又兴建了北堂，所以汤若望修建的天主教堂被称为“南堂”，是北京现存的最古老的天主教堂。

(2) 1692年康熙保教令与天主教堂的兴盛

1661年到1670年，由于顺治皇帝病逝，康熙皇帝因为年少还没有亲政，官员杨光先借口不满汤若望修订新法历书，参劾他妖言惑众、阴谋造反，汤若望、南怀仁(Ferdinand

① 参见文献[7]，118页

② 参见文献[8]，440页

Verbiest)等获罪入狱。特赦后,住在北京八面槽的东堂。

这个时候的北京,至少已经有了南堂和东堂两座天主教堂。

康熙亲政后,为汤若望昭雪冤案,并因此对传教士生出好感,一方面,允许北京南堂、东堂恢复宗教生活,一方面释放了广东在押的19名传教士,允许他们回各地教堂继续传教。

1688年,南怀仁病逝。病重期间,他向康熙皇帝推荐了传教士张诚(Jean - Francois Gerbillou)等五人。翌年,张诚和另一位传教士徐日昇(Thomas Pereira)奉旨随团出使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并因此大受康熙褒奖。

康熙对西方科学、文化颇有兴趣,因而厚待传教士,题写了“万有真厚”和“敬天”匾额,悬挂在天主教堂内^①。

1692年3月22日,康熙下诏书令:外国人……为我国做了很多贡献……而且品行端正……不应该禁止他们信奉的天主教流传开来;各处的天主教堂都可以保留……这条诏令从今天起,可以在全国各省施行^②。

康熙皇帝下令准许天主教在中国人中传播,这就是闻名于西方的1692年康熙保教令。

1693年,康熙患疟疾,张诚献上金鸡纳霜,立刻就痊愈了。因此康熙赐地给张诚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③。因为先前在宣武门已经有了一座教堂,而且位置比较靠南,所以这座天主堂被称为“北堂”。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皇帝是非常开明和实干的。1692年,他宣布开放整个中国,允许传播神福音,欧洲为之倾倒,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康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由于当时罗马教廷对中国教徒可以尊孔祭祖表示不满,康熙1701年给罗马回信,声明,“在中国孔子不是神,而是作为师长受到尊崇;祭祖是祭奠的礼仪,而不是宗教性仪式;而对神的称谓,天和上帝不是指物质的天而是指天地万物的主宰。”

虽然这场由教会内部的争论,到此已发展为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的直接对抗,成了历时二百多年的“中国礼仪之争”。但在康熙开放的宗教政策下,天主教在中国还是得以传教。据统计,1701年时,中国就有澳门、南京、北京三个主教区,130位传教士,近30万教徒,逾百座教堂。中国天主教堂在康熙统治时期迎来了它的全盛年代。

4. 清代初年的东正教建筑

1054年,基督教东西教会正式分裂,正教以东方教会为主,所以在中亚、西亚、俄罗斯一带信奉基督耶稣的人被称为东正教徒。

17世纪中叶,沙俄在雅克萨与清朝军队两次交手,俄国战败,双方签署了《雅克萨条约》。数十名战俘被押送回北京,受到了优厚待遇。

1685年,康熙皇帝为了照顾他们的宗教信仰,把北京东直门内的一座庙宇(罗刹庙)

① 参见文献[8],442页

② 参见文献[8],442、443页

③ 参见文献[8],443页

送给战俘们作教堂,这就是北京的索菲亚教堂。又因为教堂中悬挂着一幅尼古拉圣像,所以又称为尼古拉教堂。

东正教信徒在北京的活动引起了沙俄帝国的注意,1716年,彼得大帝正式派遣第一批东正教传教士赴北京传教,兼任外交官员。他们住在尼古拉教堂内,外人称之为俄罗斯“北馆”。

1729年,根据中俄1727年《恰克图条约》清政府出资帮助俄罗斯传教工团在北京东江米巷(即东交民巷)兴建了一座新的东正教堂,名为“奉献圣婴堂”,又名“奉献节教堂”。因为地理位置较尼古拉教堂为南,所以外人称之为俄罗斯“南馆”。

南馆和北馆一起,成为中国东正教的传教中心。

5. 中国境内犹太人礼拜寺建筑

17世纪初,利玛窦到达北京。1605年6月下旬的某一天,有一个居住在中国开封的犹太人赶到北京造访了利玛窦。史载,这个人名叫艾田^①。

利玛窦和艾田也许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一次简单友好的会晤竟然拉开了长达3个多世纪寻找中国犹太人的序幕。

(1) 犹太人到中国的时间

史料对犹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记载并不一致,比较多的提法一种是:公元前,可能有部分犹太人随丝绸之路的经商到达中国西域地方。——《旧约·阿摩司书》第3章第12节中提到,“住在撒马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角,或是铺着绣花毯的靠床上”,这里实际上说的是丝织的垫毯,应该是与中国商业往来的货物——因为犹太人的商业天赋是举世公认的;另一种说法是公元后70年,大约是东汉时期,由于罗马摧毁了耶路撒冷,大批犹太人东迁,并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1723年骆保禄(P. Sean-Paul Gozau)神甫在开封了解到犹太人在1650年前抵达中国,应该是公元73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这和罗马征服耶路撒冷的时间是吻合的。

(2) 利玛窦发现的开封犹太人和“礼拜寺”

利玛窦记载,犹太人艾田介绍开封大约有十二家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礼拜寺,又叫“犹太会堂”。礼拜寺藏有犹太教《摩西五经》,所以推测可能建筑有藏经楼。

当地犹太人对礼拜寺的管理是很尽心的,不仅有专门的拉比(掌教人)负责礼拜寺和经卷的管理,而且“不久前才花去一万金币修复”。也就是说,开封的犹太人礼拜寺在17世纪前后进行过一次比较大的修缮。

(3) 耶稣会传教士发现的开封犹太人和“礼拜寺”

1613年,有“欧洲孔夫子”之称的传教士艾儒略(Julius Aleni)奉罗马教廷之命前往开封,见到了“礼拜寺”,但是没有见到藏经的地方,因为“有帷幕隔着,引领的人不肯掀开”。

前文提到的传教士骆保禄1704年访问开封,参观了“礼拜寺”,在寺中见到各种碑文和匾联。他获准进入了藏经的“至圣所”,或者叫做“天堂”(Bethel),“里面放了13张案桌,陈放13个经龕,罩着帐幔。”

^① 参见文献[10],1~2页

可以推测,摆放了13张案桌的藏经建筑规模还是可观的。同时由于“至圣所”是只允许掌教人进入的地方,又称为“天堂”,可以想象内部的光线效果可能比较神秘,环境比较暗,光线从墙缝和天窗洒落下来。

1722年,康熙六十年,另一位传教士孟正气(P. Jean Domenge)在开封住了八个多月,并画了两张开封“礼拜寺”的线条图,成为极其珍贵的文献^①。

这两幅图:一为寺之全形,一为寺后殿之内部。据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所说:“吾人读康熙二年碑阴题名,见有所谓教祖殿、圣祖殿、尊经龛、北经堂、南经堂、焚修住宅等,皆莫知其方向及位置所在,得杜氏之图,……可按图而索也。”

据图,全寺深约四百尺,广约百五十尺,东向。四周大围墙。进东街栅门,则见有大牌坊,坊有敬天祝国匾,是为大门。大门左右有花墙。大门内有甬道至二门。二门内为大院,中亦有牌坊,左右有碑亭。亭度弘治正德碑。两旁有横门,门通焚修住室。碑亭后有石狮铜炉之属,是为前殿。殿前月台石栏极壮观。殿旁两厢南北向者为诵经堂,亦名讲堂。北讲堂之西为厨房。殿左右东向者为教祖、圣祖殿。殿后有行廊通后殿。殿深60尺,两壁皆窗,前有烛台供桌,旁有盥手盘。中有坛,坛置高椅。椅后为万岁龙楼。楼后最深处为尊经龛。龛藏新纂而最古之摩西五经一部。龛前有幔,极丽。两楹有经橱,橱置续修之摩西五经十二部。壁左右有金字希伯来文,书摩西十诫。殿顶有通天之牖^②。

(4) 从弘治碑看犹太人的“礼拜寺”

开封犹太人遗留下来几块石碑,是考证中国犹太人历史的犹太人“礼拜寺”的重要依据。

其中一块最初是1489年(明孝宗弘治二年)立的,碑文为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③,明正德七年(1512年)加刻了反面的碑文,为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④。

此碑1912年末年移至加拿大圣公会“三一堂”大门右侧,这是后话。

碑文说:“1163年,宋孝宗隆兴元年(金世宗大定三年)……建筑司盖起了这座礼拜寺。1279年元年,元至元十六年重建。这座寺位于‘土市字街’东南位置,四面各350英尺。”

江文汉先生考证:开封礼拜寺坐西朝东,寺西面贯穿南北的街道为土街,由于开封风沙大,需要填土防沙,所以这条街得名于过去的土方市场。加拿大圣公会购买礼拜寺时,发现旧址有很多处积水,因为土方被周边的人挖去盖房子了。旧址占地长350英尺,宽250英尺,位于土街和火神庙街交叉十字街东南角。所以江文汉先生认为碑中所说的“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应该是“坐落土市十字街东南”的谬误。礼拜寺东大门面向挑筋教胡同,便于犹太人参加礼拜。

碑文说:“明太祖开国以后,安抚人心……天下人安居乐业……永乐十九年(1421年)医生俺城……重修礼拜寺,在寺中供奉了皇上的牌位……正统十年,李荣、李良自己筹

① 参见文献[1],part I Chapter4,31页

② 参见文献[2],91、92页

③ 参见文献[2],65~68页

④ 参见文献[2],68~71页

集资金重新修建了三间前殿,天顺五年(1461年)的时候黄河决堤,冲垮礼拜寺,仅留下地基……李荣又筹集钱翻修,镏金彩绘装饰,焕然一新。成化年,高鉴、高锐、高铉筹资加建了三间后殿,同样镏金彩绘,华丽非凡,用来摆放三部经书。后殿与前殿用穿廊连接……宁夏人金宣……买了供桌案台、铜香炉、水瓶、蜡烛台。弘治二年,他的弟弟金瑛买了礼拜寺的一块地,和钟托、赵俊立了碑石……大家把经龛、经楼、经桌、栏杆、供桌等画上了彩绘,金碧辉煌。”

碑身反面的《尊崇道经寺记》记载:“明正德七年孟秋甲子重建礼拜寺……宁夏金润金钟盖了一座碑亭。”

(5) 从康熙碑看犹太人的礼拜寺

另一块碑是1663年清康熙二年所立,现在只剩下碑文“重建清真寺记”的拓片,保留在罗马^①。

碑文说:“这座礼拜寺最初是宋孝宗隆兴元年建筑司盖的……到了顺至十年,大家商量捐钱重修……完全按照原来寺的规模复原……把前殿从黄沙中发掘出来,重立了前殿……捐资重盖了三间讲堂,三扇大门,三扇小门,三间厨房,一座牌坊,其他殿堂九间,殿中央有一座皇帝的万岁楼,两座碑亭。还有两间住房,浓丽的红白黑油漆,装饰,非常壮丽辉煌。”

碑身反面的题文说:“……重修了三建前殿,三间教祖殿,供奉阿无罗汉,三间后殿,供奉一座经龛……三间圣祖殿,供奉圣祖七摄(弥塞亚、犹太教的救世主),三扇大门,三扇小门,六副铜香炉净水瓶……南北各三间诵经堂……一座牌坊……一座皇清万岁龙楼……九间行殿,殿中有栏杆、地板、烛台、供桌、行殿到大门的甬路、到南诵经堂的甬路……一眼附石栏杆的水井、一对石狮、一座风灯、五道竹帘、七面花屏、三副铜炉……三座铜制莲花灯,行殿前有月台、石栏,通往北诵经堂有甬路……另有三间厨房……周围有一道很高的围墙……大门外有种花的矮墙和月台,内里还有住所……”

所以这样一来,礼拜寺的规模“仿佛有了昔日的盛况”,甚至因为装饰漆彩“黑白分明,比过去更加壮观。”

康熙碑,还有前面提到的弘治碑,都把礼拜寺称为清真寺,弘治碑反面的《尊崇道经寺记》则避免了“清真”两个字,避免和回教混淆。

综上所述,从各种文献上都能看出当年的礼拜寺是很具独特形制的中西合璧的教堂建筑。开封礼拜寺始建于金,始修于元,历明迄清,凡五百年。修建者凡十次,大抵与河患有关,亦与本教之兴衰有关^②。

6. 清代后期的禁教与宗教建筑的衰亡

1701年,康熙皇帝就中国礼仪问题对罗马教皇的答复没有打动罗马教廷的心。

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二世(Clemend XII)禁止中国教友使用中国礼节,禁止祭祖尊孔,禁止用“上帝”和“天”称神,只许使用“天主”一词,违背者将被逐出教会。

^① 参见文献[2],71~77页

^② 参见文献[2],90,91页

1717年,被挑衅激怒的康熙皇帝和清政府决定,禁信基督教,拆毁教堂,驱逐传教士。1722年,康熙病逝。两年后,雍正皇帝下令封闭教堂,当时全国各地300多座教堂大部分改为公廨和仓库。

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Benedict XIV)发表谕旨维护宗教裁判所禁令,“绝对”禁止中国礼节。

1811年,嘉庆皇帝再次发布禁教令,北京东堂失火,西堂被卖。

至此,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的毕生业绩毁于一旦。中国的教堂建筑再次转入黑暗时期。

谁也不会想到,仅仅30年之后,西方的基督教和教堂又卷土重来。但是这一次,形势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

四 鸦片战争与教堂建筑

1. 时代背景概述

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还有帝国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它们带给海外传教,尤其是向远东向中国传教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色彩。

1807年,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C. Robert Morrison)抵达广东,不过中国人对罗马教廷的固执结怨已经激化,所以直到他1834年病逝,实际上28年间几乎没有做什么传教的实质性工作^①。

稍后,一场大规模的传教运动席卷而来。1840年的战败作为国耻会永远铭刻在中国人心里,《南京条约》带来了一个产物,天主教和新教新一次的尝试成为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深谋远虑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方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秦家懿和孔汉思(Hans Kung)认为:这样一来,基督教化意味着殖民化——商人、士兵和传教士并肩战斗!传教士和所有的白种人一样相信自己的种族优越,一旦面对它国本地传统问题,他们十有八九表现得不体谅,不变通并且桀傲不驯。他们也不计较使用什么手段(签订条约,诉讼法庭,甚至贿赂)。传教士利用教堂、学校和医院赢来西方文明的文化统治^②。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通商口岸可以修建礼拜堂;同年《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如果有破坏法国礼拜堂、墓地,中国地方官员要抓拿他们并严惩。”1846年,清道光皇帝下诏书,宣布“所有在康熙年间的天主教堂……归还给那里的教徒”;1858年,中英法俄美《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自由进入内地传教、建立教堂。

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基督教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并没有遵循以往宗教传播的正常途径,而是以武力为后盾,以一种侵略式的传教方式,强行进入中国内地,引发的只能是中国人极大的抵触情绪。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这场信仰、民族和生存的惨烈搏斗,促使中国有头脑的人

^① 参见文献[9],219页

^② 参见文献[9],220页

产生了一个疑问：基督教的根本教义便是爱上帝与爱人如己，甚至如上帝的纯爱博施于一切好人坏人那样，要爱仇敌如同爱自己；然而基督教文明所培育出来的、为保护基督教传教事业而战的军队，乃至不少有过“重生”经验的西方传教士，却是如此充满对同类的仇恨，那么基督教教化的好处究竟何在呢？此种理想与现实分歧，不易为中国人所理解，大概也有文化上的原因。中国文化重实践，重知行合一，重听其言而观其行，往往并非依靠哲学论证的有效性，而是靠实践来检验真理之真伪。总之。需要知道近百年来西方在中国强力传教以及护教军队在中国人心中所造成的极端痛苦与屈辱的残伤，方能理解何以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知识界中发生如此广阔的反基督教运动，50年代在中国教会中发生如此深刻的反帝三自爱国运动，以及为什么至今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基督教有着本能的警惕心理^①。

毋庸讳言，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成果，教堂建筑就对中国近代建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所有不平等条约中所涉及通商口岸的建筑，首当其冲地受到欧洲基督教堂带来的巨大冲击。大凡论及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洋化”端倪时，总离不开提及西方教堂建筑在当地的建造。

2. 鸦片战争以后的教堂建筑

(1) 鸦片战争以后教堂建筑的特点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半个世纪内，这个时期由于传教活动的顺利展开，教堂兴建的速度、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了过去数百年努力的成果。

这一时期内兴建的基督教堂通常直接采用欧洲教堂的式样，引入了哥特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和古典主义的教堂建筑式样。一方面是古典柱式、半圆形的拱券、厚实墙、圆形和椭圆形的水平向厚檐、波浪形的曲面、规则几何形的屋顶；一方面是高耸入云的钟楼、坡度陡峭的双坡屋面、凌空穿越的飞扶壁、镶嵌彩色玻璃玫瑰花窗，大面积的壁画和天顶画、大量的雕像和堆砌的装饰。如果说元代孟高维诺修建的天主教堂带给中国人的是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惊异，那么这一次欧式教堂所带来的，将是中国人在内心震撼之后引发而来的观念上的改变。

中国建筑工于线条，而西方建筑长于体积。中国画表现建筑，可以是崇山峻岭，绿树丛中掩映出古刹一角，因为中国建筑的韵味并不取决于体量和轮廓，而是蕴含在线条所表达的谦和包容之中。中国古建筑做不成剪影，因为从轮廓中，很难分清两幢建筑之间的差异；中国古建筑也不适宜做成木刻，因为过分强烈的黑白关系和耀眼光影效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一种忍让、迟缓的精神象征。

随着欧式教堂建筑的大规模进入，中国人吃惊地发现，原来庄重与活泼、内敛与张扬可以集中为一体，原来没有什么能够比阳光可以给教堂提供更多自然的印象，原来人与神交往是可以有一种平等的，但是又颇为神秘的地方，自由地，亲切地，而又可以深入地进行下去。

这是一种无从排斥的精神教化，虽然由于战争也许一切都还显得粗糙，但是它们即将

^① 参见文献[8]，464页

揭开中国近代建筑的帷幕。

(2) 19世纪营口教堂建筑

1858年根据《天津条约》，营口被辟为通商口岸。

1868年，英国牧师宾维廉·罗约翰抵达营口，在重胜街设立了中华基督教会。后建设基督教社交会堂、神召分会、复临安息日会，共计礼拜堂一座，福音堂四座，圣经学院一座。

1870年，英国牧师康慕恩创立安立甘堂，供神职人员居住。

1872年，法国教士锡梦来营口传教，在东双桥建立天主教堂。

文献记载，1905年营口有西洋教堂四所，分别为大英礼拜堂一所、长老堂一所，天主教堂两所。后来东双桥又有美国神召会神福音堂，估衣街有德国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

1871年贸易营口之松江船户集资在中市修建天主教堂，将旧有土房20余间略加修饰改为圣堂，1872年建成。1881年又集资改筑为瓦房，次年建成立碑，颜曰“圣母海星堂”。这座天主教堂内部采用传统抬梁式木构架，五架梁前后各加二步架，内厅有两排柱子，外墙抹白灰面，一如江南民间建筑。抹面上还作成一种略如云气纹的几何图案，型制很特别。营口外国人墓地同教堂设在一起^①。

(3) 19世纪沈阳教堂建筑

沈阳接受外来建筑的初期，这些营造活动都被关在城门外，老城内延续着传统的营造方式，这在中国近代早期建筑史上是很少见的。

1875年，清咸丰十一年，法国传教士方若望在奉天（沈阳旧称）天佑门外修建了高两层的纯正哥特式天主教堂，并建有育婴堂、学校等附属建筑，该堂为南关天主教堂，1900年被焚毁。

1889年，英国传教士罗约翰在奉天大车门外修建了一座能容纳800人的东关礼拜堂，总体造型是欧式教堂形象，门窗发尖拱券，但中央高耸的塔楼是重檐歇山式的中国式楼阁^②。

(4) 19世纪北京教堂建筑

鸦片战争以前，北京著名教堂有天主教教堂的南、北两堂，东正教的南、北两馆。

南堂1860年后重新开放，原有的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和传教翻译人员的住宅经清朝时期的两次地震和乾隆四十年（1775年）大火，毁损严重。重新修复时，只恢复了大堂。1900年，南堂因义和团运动再次被焚毁。

北堂，原址在府佑街蚕池口，1890年，光绪十六年时，慈禧太后扩充西苑，因为害怕人们可以从教堂钟楼眺望中南海，于是划出西什库20英亩地皮，补偿搬迁费17500英镑。

搬迁后的北堂院内，保留了原来皇室所建两座中国传统风格的亭子，后几经扩建^③。

北馆、南馆均在鸦片战争后重新开放，作东正教堂。北馆1900年被义和团烧毁，南馆因位于东交民巷俄国领事馆内，得以保存。

① 参见：中国近代建筑总览·营口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19页

② 参见：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沈阳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③ 参见文献[7]，118、119页

北京另有著名的天主教堂东、西两堂,1811年嘉庆皇帝发布禁教令后,西堂被卖;东堂毁于火灾,后重建。

(5) 19世纪天津教堂建筑

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埠。

1861年6月,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著援约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签定《天津柴竹林法国租地条款》,选择海河北岸三岔河口的崇禧观一带作为未来教堂的用地。

1862年初,崇厚将该地带15亩地永租给法国教会传教士孟振生。

1869年,天津教务主持传教士谢福音委托法国驻军拆除崇禧观,在该地址重建天主教堂^①。教堂位于三岔河口,面向海河,坐北朝南,青砖木结构,主体高10米,长30米,宽10米。正面三座塔楼呈笔架形。它的玻璃窗由彩色的几何图形组成,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气氛十分神秘。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中,望海楼天主教堂被焚毁。1897年重建,1900年再度被烧毁。

(6) 19世纪上海教堂建筑

上海早期教堂建筑立面上不断出现圆拱、弧拱的表现手法,礼拜教堂山墙的窗、钟楼的墙洞等采用圆拱。窗、檐、走廊等采用弧拱,大门檐、窗檐采用半圆拱券。

1846年,根据道光皇帝奉还康熙年间各地所修建天主堂的谕令,上海将南门外徐家汇一处天主堂交给法国教会,1847年修复为罗马式建筑。

1847年,天主教教会占据董家渡大悲阁庙产,11月,天主堂奠基,1853年3月落成,定名为圣沙勿略天主堂。

该堂由范廷佐修士设计,平面为长方形,砖木结构。建筑正立面为巴洛克形式。入口有三个,正门朝南,两侧边门设防风门。紧靠山墙面,有8根立柱,多立克柱头,柱身截面呈矩形,两两成束。正部四根立柱夹对联一幅,两侧四根立柱各夹圣像一座。山墙分为两段。下部为等腰梯形,中部有一块西式钟座,两侧为高起的塔楼,塔楼正立面有百叶,攒尖顶,盔式檐,上部为三角形,竖向题名“天主堂”。山墙顶部有十字架一幅。室内承重柱为方形砖柱,约一米见方,柱身上与正立面类似,有浮雕状的西洋柱式。大堂共三跨,两侧跨中部四根方柱各围合成一座小祭台,柱间发券,券上有泥塑浮雕中跨正对中央大门的尽端设大祭台一座,祭台与大堂坐席之间有矮栏杆分隔。内墙面和弧引天花平整光洁,顶部有花纹。大祭台东西两侧墙上开半圆玻璃窗孔,设固定铁栅。室内地坪铺设大方砖,座席为长条木椅。室内边挂有很多楹联,承袭了中国装饰的习俗^②。

上海另一座,1847年始建的著名的礼拜堂圣云堂,位于海关两侧,江西中路、九江路口。1866年重建,1869年竣工,耗资白银7万两。

教堂由著名教堂建筑师考特参照13世纪高直式礼拜堂设计,番汉公司承造。教堂平面呈长方形,东西走向。内部长47米,宽18米,高约17米,入口位于东向中央,设门廊。门廊正立面有柱四根,两侧为方形束柱,中间为圆柱。中央两柱发半圆券,两侧发二圆心

^① 参见文献[12],85页

^② 参见文献[13],85页

尖券。经门厅进入大堂,南北向走道经边门进入大堂。正对大门尽端为祭坛,,其后为半圆龛。讲经台,读经台,洗礼池刻工精致。堂内外有柱廊,柱廊与大堂的侧窗发二圆心尖券。东立面山墙为三角形,檐口密排小券,山墙中央有玫瑰圆窗。

1873年,从其他教堂移装了壁画到两侧走廊内。1893年,教堂北侧加建直高式钟塔,塔座与原堂相同,中央六锥顶高均18米,四角有4个小尖顶。钟塔内装置八音钟,可以按照圣诗的音韵鸣响。

教堂结构将重量及伸引力集中在石柱及拱壁上,堂内中屋用剪刀形木屋架,铺设石板屋面。原堂基地加固共用木桩8000多根,其中4.75米长的3400根,3.66米长2470根,1.52米长的1660根。钟塔基地加固共用4.75米长木桩625根,其上铺设厚花岗石板^①。

教堂的周围有大片的绿地,种植了许多树木,环境幽静。

(7) 19世纪南京的教堂建筑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签定《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碑保存于南京石鼓路天主教堂。法国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教堂建于1868年,同治七年,1870年竣工,建造人为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雷橘俊,初建时名为“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堂”^②。

教堂坐北面南,平面为十字形,砖木结构,人字坡顶,木屋架,瓦楞镀锌铁皮屋面正立面呈左中右三段,中间高,两边低,左右对称。高两层,中间为三角山墙,顶端有十字架,两侧为单坡山墙,拱形门窗。中部山墙正中有圆形窗洞。教堂内部三跨,中跨度大,与正立面吻合,中部高耸,侧廓低矮。内天花为圆弧拱顶,柱间分券,堂内绘有多种图案。教堂正中设祭坛,置圣母像,祭坛后部中央设钟楼一座,顶部有十字架。

这座教堂为一座罗马风(Romauesque)建筑,正前设圆形雕饰花坛一座,周边绿树环绕,气氛幽静。

(8) 19世纪广州教堂建筑

广州是较早进入中国近代史舞台的城市,也是近代多数传教士到达中国后最初立足的地方。

1863年法国天主教会租用原清朝两广总督行署遗址用地,兴建教堂,历时25年,于1888年竣工,取名为圣心大教堂。

圣心堂位于广州一德西路,为花岗石砌筑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又名“石室”。

教堂前部,两座巍峨高耸的尖顶石塔直指天空,象征着向天国升华,皈依上帝。石塔总高度为57.95米,其中平台天面至塔尖为29.28米,上面悬挂着一组大钟。礼拜堂宽敞宏伟,进深78.69米,东西宽35.5米。教堂内部以交叉线条建成一个连着一个的拱形穹窿,图案相当优美。正门及四周门窗,都采用合掌形式,镶嵌着红、蓝、绿等深色图案玻璃,可避免室外强光照射,既和谐美观,又使堂内光线柔和,有效地烘托了教堂内肃穆、庄严而神秘的宗教气氛。

教堂所在地原为清朝两广总督行署遗址,兴建时教堂原占地面积达四万平方米。四

^① 参见文献[13],88页

^② 参见文献[14],343、344页

周附设医院、育婴堂和主教、神甫宿舍等。这些后来都已改作他用^①。

(9) 19世纪太原教堂建筑

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堂建筑的分布向中原推进。

1870年,山西主教江类思在太原东三道巷建教堂,该堂1900年焚毁,1903年重建。

1870—1880年建成圪撩沟大教堂。设计人为建筑师李有刚。教堂39米,宽19米,面积约570平方米。坐西向东,为罗马式,正立面中央塔楼20多米,两侧各有一个小塔楼,高10多米^②。

1897年,板寺山圣母殿奠基,翌年竣工,1910至1914年扩建八间后楼,设计师李有刚。

教堂全名“天神之后圣母博俊大辣殿”位于阳县东南方板寺山上,选址很好,门前山路曲折。远望教堂,在绿树丛中高高耸立在山上,十分醒目。

教堂面阔三间,进深八间,立面两层,重复使用券柱手法。立面正中有门楼,西侧设钟楼,轮廓鲜明,造型秀美^③。

另外,在此期间建筑的教堂还有1882年的河上嘴教堂,1884年红沟教堂,1897年?子上教堂,以及建筑师李有刚设计的洞儿沟方济各会院、南郊西柳材教堂。

教会建筑的传入使太原旧城受到外来建筑文化影响,出现早期西式房屋。

五 20世纪教堂建筑

1. 文化的十字路口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各地的教案开始增多。这是一个警兆,但是大多数外籍教士忽视了它。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场中国的农民革命融入了误解的基督教思想,与传教士发生了冲突,但是随着它的被镇压,传教士也忽略了这次革命的影响。

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旗帜的时候,传教士们才惊觉,原来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对那些耸立在低矮的破旧的大屋顶建筑中的西式教堂,竟然存着这么大的仇恨,而这个仇恨的警报,早已经在1870年天津大屠杀火烧望海楼的事件中拉响了。

西方的传教士们也许开始意识到,一直以来倚仗列强炮舰外交的保护,来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是一个错误,这种宗教上介入政治的做法,是给传教蒙上了“机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果。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可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教堂建筑。

中国本土悠久的文化、宗教传统,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一种全民性的文化优越感,面对基督教特有的要求和难辞其责的罗马教廷对以往在中国传教方式的非难以及固执的禁

^① 参见文献[7],126页

^② 参见:金志强等.太原近代建筑概说.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25、26页

^③ 参见:金志强等.太原近代建筑概说.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25、26页

令,这其中的矛盾引发的是一种中国对外来基督教文化的排斥,在这种境地下外国传教士们顽固地推行隔绝中国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教和建设活动,结果只能是抗拒。

所以,当传教士再一次小心翼翼地试图重来的时候,他们开始进行了一种在文化认同上的努力,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找到了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它是反映在建筑上的。

2. 20 世纪上半叶的教堂建筑

(1) 形式的改变

不管是在沿海一带还是在内地,教堂建筑都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形式。传教士在沿海一带为了化解当代对基督教普遍的排斥,开始动脑筋琢磨形式上的变化,当时所建的礼拜堂在屋顶的装饰上有许多中国式的小白塔,这是为了缓和佛教、道教信徒的反对而设的。另一些传教士开始仔细观察本地的传统建筑形式,然后在教堂上努力地加入这些元素,以一种很清晰的又是很合逻辑的符号表达出来,这样教堂看上去就有很浓的乡土气息,能够很自然地 and 周围民房融为一体。

出于相同的原因,数量众多的外国教堂的表面看来有些像中国的庙宇、祠堂,而反过来一些真正的庙宇却在立面上出现了巴洛克的装饰图案^①。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在教堂建筑上达成了某种默契,这种默契又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2) 20 世纪沈阳教堂建筑

清末,官方倡导的近代化,从仅限于对西式枪炮技术的学习,扩大到广义的科学技术的范围。积淀在沈阳老城市中深厚的传统建筑文化,开始与西方建筑文化相融合。中西混合式的建筑表达方式,成为 20 世纪初期沈阳建筑的重要特征。

1909 年,法国传教士苏培里重建南关天主教堂,由法国建筑师梁亨利设计,1912 年落成,耗资 140 万两白银。占地面积 9264 平方米,宽 19 米,进深 54 米,塔高约 40 米。

教堂为法国哥特式建筑,平面为三廊巴西利卡式。材料为沈阳传统的青砖。主体座北面南,正立面由四根壁柱纵分为三段,两侧为塔楼,立面作三段式划分,中间为正堂,立面划分为两段。中部山墙呈三角形,内发尖券,中央有圆形玫瑰窗,是为立面构图中心。

山墙檐下密布尖券,与划分立面垂直段落的尖券相呼应。山墙顶有十字架,两侧塔楼尖也有十字架。塔顶为八角锥,周围有四个小塔环绕。

这座教堂全用青砖砌筑,内外都没有做罩面,依赖中国工匠卓越的青砖砌筑技术,采用一顺一丁的法国式砌法,风格纯正,成为沈阳近代青砖建筑的巅峰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束柱的圆砖,塔尖的饰法等等都是设计师梁亨利特设砖窑烧制的,由于战火的暂时平息和中国社会观念的日趋开放,建筑设计和施工也精细得多了^②。

1927 年竣工的小南天主教神学院由罗克格·雷虎公司设计并施工。砖木结构,地上 3 层,地下一层,正立面端庄稳重,门廊为标准罗马式样,中部山墙顶端为平缓的三角形,两侧为凸出的八角形大阳台。主体立面上开窗的面积已经大大增加,说明结构上已经不

① 参见:耿阳祥,肖萍.建筑绘画.漓江出版社,1989,32 页

② 参见: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沈阳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5 页

完全依赖墙体的承重了(图2)。



图2 沈阳小南天主教神学院(1927年建)
(引自陈伯超等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沈阳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另外还有1925年5月20日竣工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砖木结构,地上3层,地下一层。1949年以后改为沈阳市第二看守所,所以不便提供照片。

(3) 20世纪哈尔滨教堂建筑

清初东正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向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地区发展。由于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接壤,因此这里的东正教建筑更有代表性。

1899年,俄国建筑师包德烈夫斯基设计了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1900年完工^①。

这座教堂为哥特式全木结构,未用一钉一铁,全部榫接木构件。造型上采用俄罗斯木结构帐篷顶传统形式,正立面门廊上方有三座小洋葱头,设十字架,正厅上部为三角锥帐篷顶,高耸入云,锥端也有小洋葱头状的穹顶,穹顶顶部也有十字架一副。教堂采用木构架井干式结构,内部形成高大的穹顶,细部雕刻精致,装饰华丽非凡(图3)。

圣尼古拉教堂又名中央寺院,俗称南岗喇嘛台,规模居哈尔滨17座教堂之首,年代最为久远。

可惜在1966年毁于“文化大革命”。

(4) 20世纪北京教堂建筑

20世纪北京重要的教堂建筑均在原有基础上修建或者是扩建。大规模兴建教堂的工程没有文献记载(图4)。

1904年,光绪三十年,最初利玛窦建造的南堂再次得以重修。

重修后的南堂保留了原来的大堂,部分附属建筑没有修复。教堂顶部为拱券,正面有精致的砖雕,柱顶有木刻浮雕鎏金花纹,彩色玻璃镶嵌门窗。堂内悬挂着大幅耶稣受难的

^① 参见:杨水生,《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失去的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图3 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1900建)
(引自罗哲文等主编,失去的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图4 北京王府井教堂(即东堂,20世纪初重建)
(引自2000年3月《南京日报》新华社传真照片)

油画,祭台上高高立着圣母像,整个教堂富丽堂皇,颇为壮观。

北馆,即圣尼古拉教堂,坐落在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东侧的原苏联大使馆内。这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东正教堂。

圣尼古拉教堂原为当地的一座关帝庙。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雅克萨战役后,康熙皇帝将这座关帝庙特赐给俘虏来的哥萨克士兵及其家属,供这些信仰东正教的教徒进行祈祷。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这些哥萨克人将关帝庙改为东正教堂。不久,沙俄教区发来证书,将这座东正教堂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

1900年,圣尼古拉教堂被义和团烧毁,该堂的一批教徒被杀死。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赔款几万两白银,用于该教堂的重建及扩充。重建后的教堂取名“致命堂”,被义和团杀死的教徒都被册封为“致命圣人”,并将其尸骨装敛在三口中国式的棺材中,葬于致命堂下。致命堂占地三亩,有房屋80多间。主要由致命堂、钟楼、中外书房及寡妇院组成。致命堂为典型的十字形东正教堂,堂顶上有五个带十字架的拱形堡,堂内装饰华丽。此馆重建后不久,沙俄又在东交民巷俄国驻华领事馆内,建起“奉献节教堂”。因此人们习惯上称北面的致命堂为北馆,南面的奉献节教堂为南馆。

1956年,苏联莫斯科教廷下令,调回全部苏籍神职人员,并将教产交还中国,教权交中国神职人员。不久,北馆改作苏联大使馆,致命堂建筑被拆除。现在,大使馆院内还保留着义和团被镇压后,清政府割让给致命堂的老四爷府的一组中式古建筑,包括北大殿五间和西殿三间。这组绿色琉璃筒瓦屋顶的建筑,吻兽为鸽形,是中国古建筑中罕见的一

例,具有较高的价值^①。

(5) 20世纪天津教堂建筑

天津“望海楼”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1904年,新的望海楼在原址的废墟上又一次建立起来。

这一次的重修维持了原来的哥特式的风格,砖木结构,以及原来的立面。增加了两侧的角楼,八角形,低于中部塔楼高度。立面中部塔楼仍作三段式划分,门窗发尖券,门两侧有扶壁。塔顶顶部为平顶,作眺望台,可以上人(图5)。

全堂平面仍为长方形,长30米,宽10米,内部并排两列庭柱,三跨三廊,没有间隔和隔层。细部的砖刻沿用了天津传统的砖雕工艺和中国式的装饰纹样。地面砌瓷质花砖,装饰精美华丽。

1913年,天津西开教堂奠基,3年后竣工。教堂因地处天津墙子河老西开地带而得名,又名“法国教堂”。

西开教堂为法国罗曼式建筑,包括了建于1914年的天主教总堂和建于1917年的大教堂,位于当年法租界滨江道顶点,为法租界底界。

教堂立面竖向由扶壁分为三段,入口居中,上部山墙为三角形,山墙上刻有十字架,中部分半圆拱券。入口两侧为塔楼,三段式划分,顶部为穹窿,作顶塔眺楼,穹顶名有十字架一副。外墙上有半圆叠涩拱窗,檐下连续发券,入口门洞使用逐层向内凹入的带状浮雕花饰,墙面做红白相间的水平砖砌条纹,是典型的罗曼式建筑风格(图6)。

教堂平面呈长十字形,三跨通廊,内部为方柱,入口中央尽端祭坛,其后为半圆形祭台,又设三个半圆形壁龛(图7)。内堂上部为穹窿顶,内拱道交叉处顶部也是穹窿。从外看则是三个高耸的圆拱球形屋顶,十分醒目。

教堂细部采用组合式柱式,古典式线脚,玫瑰窗,上部砌成绿色圆肚形尖顶,檐下砌成半圆形拱窗,墙壁绘有壁画,细腻典雅,气氛神圣而肃穆^②。

1916年,法汉学校迁至西开教堂前,与教堂构成一组完整的建筑群。屋面的作法、窗下宝瓶花饰和檐下牛腿曲线,都是法国当时最流行的样式^③。学校等三层为神职人员宿舍,窗户分割成狭窄的竖条形状,既是一所现代的学校建筑,又渲染了宗教气氛^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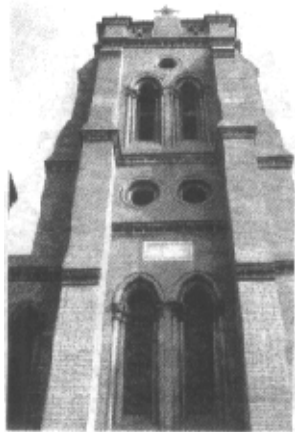


图5 天津望海楼教堂(1904年建)
(引自文献[12])

① 参见文献[7],119、120页

② 参见文献[12],85页

③ 参见文献[12],85页

④ 参见文献[12],86页



图6 天津西开教堂(1913年建)
(引自文献[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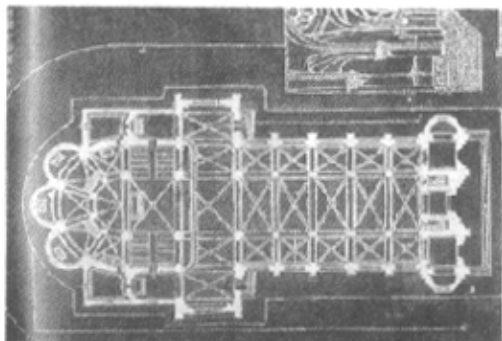


图7 天津西开教堂平面
(引自文献[12])

1924年,天津工商学院西南端小教堂落成,永和营造工程公司设计并施工^①。

小教堂的入口部分,采用四根古典柱式,楼前两翼突出。围合成一个开敞而宁静的小场地。柱中间有一个穹窿,八瓣形,开设圆老虎窗,穹顶有十字架一副。穹窿后侧为三角形山墙。

教堂运用灰红色清水砖墙的色彩效果,实墙面和假窗在立面上虚实相间,粗犷的毛石墙座和上层细腻平整砖墙的质感,形成了对比效果,充分体现了法国古典主义设计手法的情趣。

(6) 20世纪上海教堂建筑

19世纪中叶,上海出现了完全西式的教堂。它们由传教士设计,中国工匠建造,主要造型比例构造均为西式,细部装饰采用中国建筑的传统手法。

20世纪,新建的教堂建筑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形式有了相应的变化。

徐家汇老教堂1890年以后开办孤儿院和编织业作坊,面积不敷使用,所以1910年在老堂西南面建新教堂,取名圣依纳爵堂^②。

新教堂为法国高直式建筑,《徐汇记略》记载,钟楼高17丈,堂脊高8丈,宽9丈,中部宽10丈,进深25丈,能容纳2500余人。

正立面分左中右三段,中部门廊,发逐层内凹式尖券。两侧为塔楼,高耸入云,高50米。塔楼底部与门廊类似,逐层发尖券。稍小于门廊尖券。塔楼顶部为八角锥顶,上开尖券式老虎窗,锥顶各有十字架一副。中部门廊与塔楼均凸出于正堂,正堂开大型圆玫瑰窗

① 参见文献[12],86页

② 参见文献[13],88页

一扇,山墙为三角顶,镌刻叶状浮雕(图8)。



图8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1910年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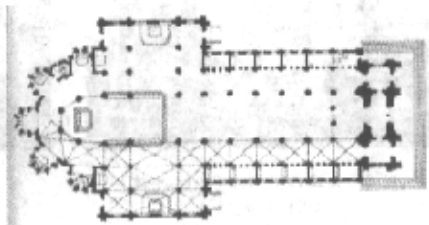


图9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平面

教堂平面为T型,大门朝东。中央尽端为祭坛,后为半圆形祭台,设半圆壁龛五座(图9)。堂内柱为组合式束柱形式,侧廊柱间发尖券。室内大方砖铺地,中间走道铺花瓷砖。所有门窗檐均为高直式尖拱,四周大多是铅条彩色圣像玻璃窗,所有线脚、花饰、雕刻均为大理石,精致异常。室内共有祭台21座。

正门有浮雕圣像,四周水落接头处有兽形装饰,钟楼尖顶为淡紫灰色的石片瓦,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气氛。

1920年,位于贝当路、巨福路的国际礼拜堂落成,属近代教堂建筑形式。

礼拜堂为砖木结构,屋顶为剪刀形木屋架,翼端屋面坡度陡峭。侧立面有凹凸变化,凸出的墙顶部为三角形。

礼拜堂呈L型分布,大门向北,有一条甬道可通向教堂内部。两侧设有尖拱长廊,中央尽端为升高的祭台,发二圆心尖券。窗檐为弧拱形,镶嵌冰梅纹玻璃。坐位是单人靠椅,椅背装有放置经书的匣子,室内设暖气设备。

翼端三层,窗檐为平拱,走道是磨石子地坪。底层为牧师办公室,二楼为幼儿园,三楼为小礼拜堂,室内设暖气设备。

L型建筑围合出一块很大的空地,边缘种植花草,环境幽雅^①。

位于汉口路、云南路口的慕尔堂早期为监理会堂,1929年在虞洽卿路跑马厅对面建造新堂,设计人邬达克,据1935年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记载,耗资白银25万两。

^① 参见文献[13],93页

该堂为砖木结构,平面为田型,中部为大礼堂,正厅容纳 560 人,楼座位 80 人,唱诗班 60 人。大堂向西,经门厅进入礼堂,尽端为抬高的祭坛,其后为唱诗班席位。祭坛为高直尖券,悬挂大十字架。楼座也为高直尖券。南北两端有水泥楼梯,扶手纤细美观。大堂内方柱和楼座栏杆均为斩假石饰面,讲经台也用斩假石做成。室内慢尖拱顶为水泥制。铅条花色玻璃窗以黄色为主,即使在阴天也好像有微弱的阳光照射,营造出自然而神秘的气氛。

门厅兼作休息室。上部利用架空屋架中的空间作小礼堂,马赛克地板,木构尖拱屋顶,暴露屋架梁,窗棂为高直尖券,墙面装有壁灯。

该堂的西北、西南、东南三部分均为三层,作牧师办公室、幼儿园、妇女会堂、课堂、宿舍。

整个建筑除礼堂、拱廊和窗棂等用尖拱外,一般均用吊平顶和平过梁窗棂。墙面很少凹凸线条,仅镶贴花面砖,基本上采用美国殖民地式建筑的处理方法^①。

余山天主堂旧堂平面为十字形,中西混合建筑式样,1935 年 4 月重建,设计者为葡萄牙人叶肇昌。1935 年 11 月竣工^②。

新堂为罗马式样。东立面为翼端立面,由六根方形壁柱分为横向五段,纵向两段。中部下侧为正门,发弧形券,上部山墙为三角形,顶端设十字架,墙上发半圆券,假窗也是高直半圆券,并有逐层凹入装饰线条。两侧为较矮的平山墙,两侧四根壁柱延续伸出山墙,四角锥结束。

礼堂平面为长方形,东侧有方形翼部,南、西、北均有大门进入大堂。正门位于西南面,南面东侧设边门,进入门厅后通大堂,东端设楼梯。大堂长 55.85 米,宽 24.68 米,容纳 3000 余人,净高 16.46 米,面对南向、西向大门尽端各设祭台一座,其后为半圆龛。西向正祭坛用镶金嵌碧的大理石雕刻而成,祭坛后为高直半圆券窗,光线透明,好像极乐世界。大堂内为砖束柱,半圆拱券,高耸挺拔。尽端上空中的十字架掩映在背后顶窗的耀眼光线之中,若隐若现。

东首翼端楼下为圣衣间,非常宽敞,楼上为主教卧室。

大堂为钢筋混凝土拱顶屋盖,墙身下部用金山石砌筑,石柱用金山石或斩假石,结构坚固。

教堂外墙用红砖砌筑,部分屋顶为琉璃瓦,座堂花瓷砖铺地,祭坛与座堂间用低矮的汉白玉石栏杆分隔,矮门为铸铁贴金,大理石铺地。教堂四周是镶嵌着彩色圣像的玻璃窗,窗顶均为尖拱形,大堂外立两檐部下排列有半圆券。

西南角为钟楼,高 38 米,楼座为方形,开半圆券窗洞,中间鼓座为多立克柱式,上部为穹窿,穹顶矗立着一尊铜铸的圣母像,高 4.8 米,重 1200 公斤。鼓座周围亦有四座小穹窿。

教堂后半山上还有一组小建筑群。以一座二层砖木结构的中西混合式建筑为主体,是传教士起居膳宿用的。西边有罗马式纪念碑亭一座为路德亭,六角镂空亭一座。装饰

① 参见文献[13],93 页

② 参见文献[13],94、101、102 页

细致花纹中西混合,为圣像亭。

此外,沿着通往教堂去的“之”字形山路,有14座苦路亭设于转折处,水磨方砖镶面,山墙和拱圈有罗马式风格,整体型和顶部铺瓦又极像中国传统建筑。亭内镌刻碑文,记载耶稣受难情况。

1931年,上海东正教堂建于亨利路,是典型的俄罗斯古典教堂^①。

教堂形体不大,但古朴完整。平面基本为文形,正中一个大的洋葱穹窿,四周四个略小。所有穹顶均设十字架一副。穹窿鼓座为方形,檐部作弧线形。

内部呈十字型布局,墙身厚,开设小窗,四壁布满俄罗斯教堂常用的油彩画条装饰,很少雕刻。教堂正中悬挂四层大吊顶灯一盏,富丽堂皇。教堂藻井天花绘有壁画,四面为穹窿鼓座上开的高窗,阳光眩目,极富宗教气氛。

圆穹铜皮屋顶为孔雀蓝色,顶尖与十字架贴涂金色,墙面粉刷黄沙水泥,窗扇由蓝绿玻璃拼合而成。建筑色彩和谐,带有浓厚的俄罗斯教堂的气氛。

东正教在高万依路设有分会教堂一座,形制与亨利路教堂基本一样。

(7) 20世纪南京教堂建筑

南京教堂建筑的形式比较特殊,由于20世纪初以后,近半个世纪内作为政治中心,深受民国时期文化洋化中用的影响,所以外来建筑以折衷主义形式居多,传统建筑样的痕迹清晰可见。

1915年,基督教圣公会道胜堂建于中山北路^②,据传原来有礼拜堂、经堂、住所多组建筑,因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时破坏,现存经堂四幢,均为中西合璧式样。

建筑为砖木结构,外部是典型歇山顶,筒瓦屋面,挑檐为直挑,较为少见。檐下有彩绘,窗格镂空雕花(图10)。建筑间有排楼一座,为连结桥,下部为圆拱门。内部装饰均为西式。总建筑面积2173平方米。



图10 南京基督教圣公会道胜堂(1915年建)
(引自文献[14])

1921年,汉中路百年堂落成,美国南卡拉那省生姆脱城三一堂揭建,因纪念监理公会

① 参见文献[13],93,94页

② 参见文献[14],189页

国外布道百年而得名^①。

建筑面东,高四层,顶部为阁楼,砖木结构。入口门廊直通二层,并凸出过层顶。门廊两侧有壁柱,方形,中部有三角拱,顶部有半圆拱。门廊上部拱形窗框装饰带有明显的折衷主义色彩。门廊两侧各四根壁柱,将立面从左至右划分成五段,开拱形大窗。顶部有老虎窗。

侧立面门廊突出,组合柱式。门廊上部平山墙凸出屋顶,两侧各有两段划分,窗框外有副产拱凹凸装饰,拱顶锁石是典型法国式风格。

百年堂东北约 20 余米,有一幢三层式建筑,风格与百年堂相近,可能是传教士住宅。

金陵神学院建筑群建于 1910 年,由陈明记营造厂承建,具有美国殖民时期风格,简朴而幽雅。青砖墙面,水泥瓦屋面,木楼板,木屋架,上下提拉木窗^②。

神学院圣道大楼坐北面南,砖林结构。立面中部翼端突出,总体平面呈十字形。主体高两层,中部门廊为三层。入口为一排连续拱券柱式的门廊,中间三拱,两侧各一拱,通向门厅。门厅两侧为内廊,内廊两侧为教室和布道堂。大楼北立面底层正中为礼拜堂,容纳二三百人,设木制圣坛,立金色十字架一副。

圣道大楼西侧和东北侧各有一幢学生宿舍,西侧学生楼高两层,砖木结构,面积 804 平方米,东北侧学生楼高三层,顶部为隔楼,建筑面积 978 平方米。学生宿舍均为四面坡屋顶,造型相似,屋顶设有老虎窗。

神学院内草木葱郁,环境幽静典雅。

1923 年,太平南路圣保罗堂落成,由建筑师齐兆昌设计监造,陈明记营造厂承建,耗资 1.2 万美元,折合 4.8 万两银元。

教堂为欧洲乡村小教堂式样,朴素典雅,由大礼拜堂、钟楼、神职人员宿舍和膳房组成,建筑面积 800 平方米^③。

建筑主体坐南面北,砖木结构,局部三层。面宽八间 11 米,进深 11 檩 13.47 米,高 11 米,连钟楼在内,建筑面积 485 平方米。立面厚重,开窗很小,砌墙的材料为明城墙砖,上部用青砖,全部加工磨光。山墙很少装饰,上部开圆形高窗,中部有两道凸凹分割线,立十字架一副。三角形山墙顶部也有小十字架一幅,两端为锥状突起。墙面以清水色缝,风格明快。礼拜堂为人字形屋顶,木结构,屋面为方形水泥平瓦。室内为三跨三廊,两侧立柱间发尖券,中部有突出的锁石,白色大理石制。窗棂为高直尖券式。室内暴露木屋架,漆色与礼拜堂长条木座椅相同。吊顶八盏。尽端祭台上的读经台、讲座台、洗礼池、圣坛、栏杆均选材精制磨光的镇江高资山白矾石。殿内墙上环箍,拱座内侧后面上的经文均贴有金箔。所有窗座、门窗、墙中部环箍、内柱架、拱座也为高资山白石(图 11)。

钟楼连接主礼拜堂,高 18.2 米,有 40 余级水泥螺旋梯通至屋顶。钟楼内置直径两米的大钟一座。钟楼外侧凸一角为六角平楼望梯,是为楼梯间,另三侧顶端有小角楼各一座,锥顶。

① 参见文献[14],188 页

② 参见:杨新华,卢海鸣主编.南京明清建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0 页

③ 参见文献[14],190,19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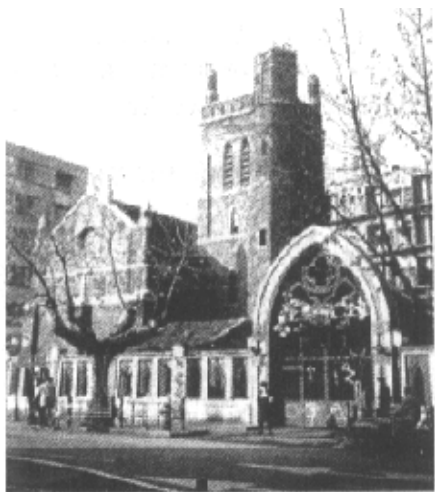


图 11 南京圣保罗堂(1923 年建)
(引自文献[14])



图 12 南京粤语浸信会堂(1936 年建)
(引自文献[14])

圣保罗堂是一位圣公信徒为纪念他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而捐建,另设有江宁东流镇分堂和江宁县汤山镇分堂各一所,毁于抗战^①。

1936 年,游府西街基督教粤语浸信会堂竣工。由李锦沛建筑师设计,福星营造厂承建,造价国币五千余元^②。

教堂为砖石结构,地上四层,可容纳百余人,中央塔楼高耸,顶部有几何凸凹,立十字架一副。两侧为两层,立面朴实无华。主礼拜堂为人字顶、钢屋架(图 12、13)。

19 世纪 80 年代,基督教会在南京建有汉中堂。1934 年因莫愁路工程,基督教会决定迁址重建基督教堂,1936 年 5 月 19 日基督教莫愁路堂破土典礼,8 月 2 日奠基,因抗战,延至 1942 年 10 月 16 日竣工。设计人建筑师陈裕华,陈明记营造厂承建,牧师孙希圣监造。

莫愁路堂为英国式建筑,坐东朝西,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1800 平方米^③。

正立面右侧为顶部三角形山墙,山墙两侧有扶壁突出,四角锥收束。幕墙由哥特式平拱门和高直尖券窗组成,门楣逐层凹龛。扶壁中由白水泥浮雕和白色磨石构成大尖拱券,高 17 米,券顶有圆形饰窗,镂刻星际和十字组成的图案。

正立面左侧为四层塔楼、平顶,作眺望台。塔楼为方形,四角有扶壁,下部开方窗,上部并列两扇高直尖券窗。塔楼顶部女儿墙为城墙垛形,四角为扶壁延伸的角锥突出。

教堂入口门廊进深 4 米,中间和两边均通礼拜堂,东侧连接钟楼。礼拜堂为穹窿顶,

① 参见:南京大观,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46 页

② 参见文献[14],195 页

③ 参见文献[14],192、19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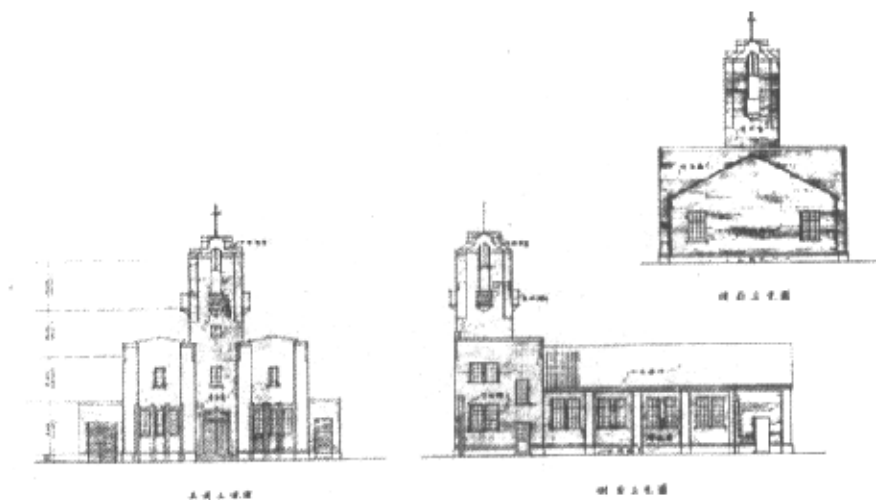


图 13 南京粤语浸信会堂工程图纸
(引自文献[14])

由十根人字形柱支撑,连接于墙壁上部。结构架由两侧向中央逐级升高,每级下有圆弧形撑托和下生物物,是典型的英国 16 世纪“都铎风格”。教堂内为三跨三廊,两侧立柱间发砖尖券,券外为内廊。主礼拜堂连两翼小礼拜堂长约 33 米,宽 29 米。

主堂中央尽端为木结构祭坛,后为木制墙裙,中间置十字架一副。祭坛上部发大尖券,墙面上有三条细长高直的尖圈玻璃窗,将虚幻的光线洒入大堂内。

莫愁路原来还有两层砖混结构布道所、宿舍、膳房各一座,与礼拜堂、钟楼构成风格统一的建筑群,后拆除。

(8) 20 世纪太原教堂建筑

进入 20 世纪以后,太原也出现了“中国宫殿式”的教堂建筑。

在首义街的基督教育年会,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山墙、入口、檐口均为中国传统硬山作法。入口加设门廊为悬山顶,挑檐深远,形制为当地建筑风格,而在门窗等细部吸收了外来的装饰纹样。

太原主教区大教堂位于大北门街,1903 年动工,1905 年竣工,耗资两万两白银^①。经后世不断扩建,逐渐形成了以教堂为中心,附设修道院、印书馆、学校、医院、修女院、育婴院、经学院、菜园、花园、主教神父住所的建筑群,占地 200 亩,有高墙环绕。

大教堂坐东朝西,罗马式建筑。高 20 米,建筑面积约 1400 平方米。教堂正面两侧有西式钟楼两座,南北相望,正中有高达 10 米的山花,顶部有铁十字架一副,高 4 米。

^① 参见:金志鹏等.太原近代建筑概说.第五届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26 页

(9) 20 世纪重庆教堂建筑

四川的教堂建筑乡土气息非常浓郁,在当时的教堂中很有特色(图 14)。



图 14 四川绵阳基督教堂

重庆南岸狮子口基督教小教堂坐落于山路尽端,两层八角式建筑,外侧二层为吊脚楼。壁柱间夹圆拱窗。攒尖屋顶,极像当地的民居建筑。

重庆南岸观音山天主教礼拜堂入口立面门廊上部突出屋顶,檐部密排圆拱券,山墙扶壁中央有圆形玫瑰窗,门廊上部发圆拱券,接三角拱,有浮雕装饰。礼拜堂窗棂为高直半圆券,壁柱为方形,建筑翼端为半圆形,人字屋顶,转角为斗笠状屋顶,类似官邸住宅。

两侧护墙借鉴了中国传统马头墙的造型,自由蜿蜒曲线在静穆庄严的气氛中增添了一丝柔和而流畅的情调。

重庆南岸周家湾小天主堂的大门和过道都隐藏在吊脚楼中,形式中西结合,流畅而富有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靠近重庆的成都,由于 1895 年成都教案中大教堂与主教公署被焚毁,1904 年重修时,设计人骆书雅把建筑总平面设计成中文“悚”字,以示教会的自警自律^①。

六 当代新教堂建筑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传教活动及教堂建筑尚能存在。1966 年开始的“十年动乱”,基督教堂和佛庙、道观、清真寺遭到了同等命运,不是被关闭、捣毁,就是被改作他用。

当基督教文化再一次与中国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时间已经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了。这一次,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讲,面向世界与各种文化进行交流,已经是一件很平常、自然的事情。

^① 参见:董黎. 华西协和大建筑考. 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 137 页

基督教堂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方面,七百多座封闭多年的天主教堂再次向公众开放,同时开放的还有成百座新教堂;此外,在各地出现愈来愈多的新建教堂。它们吸引了大批的中外基督教徒,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提供了活动场所。另一方面,西方的一些习俗、节日,比如圣诞节、婚礼等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注意。虽然他们不一定是信徒,来到教堂里体验到的是一种愉悦,一种讶异,又或者说是一种体验和企盼,人们的视线又一次投射到这些外来形式的建筑之上。

除了翻修老教堂外,这一次教堂建筑的兴建任务就落在了中国建筑师的身上。在各地的新建教堂热中,兴建速度非常快要数浙江省温州市,其为90年代后经济发展速度特别快的城市之一,又是著名的侨乡,信奉基督教的人数很多,海外的投资充裕,所以近年来,温州新建教堂19所,其中1995年1所,1996年3所,1997年2所,1998年7所,1999年3所,2000年3所。从数量和进度上来看是相当惊人的。

在这一轮,主要由中国建筑师执牛耳的教堂设计中,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1. 借鉴模仿积大成为主

就拿温州的基督教永光堂来说,其前身为松台山永光堂,1940年竣工,教堂面积380平方米,栈房面积1047平方米。1962年教堂关闭,后来政府重新划定了一块长28米,宽17.5米,面积470平方米的土地为建筑用地,外加墙围内通道面积100平方米。

设计师以原堂为本,参考了温州永加、梧田、永强等教堂的实况,并赴上海拍摄了国际和沐恩堂等的照片,最后定稿。

新教堂框架结构共三层半,建筑总面积1280平方米,包括屋顶十字架高度7米,长28米,宽15.7米,主堂650平方米。

首层设办公用房、诗班练唱室、厨房、餐厅、停车场。二至三层为圣堂,容纳1110人。讲经台尺寸7米×5.7米,面积37平方米,讲经台下为洗礼池,台上为活动式台架,容纳80人的诗班。四层为会议室、办公室和储藏室。内部喷涂白色塑胶涂料,总耗资279万元。

建成后的教堂外观贴砖红色马赛克,入口挑棚为素混凝土,两端方形支柱贴黑色大理石。正立面中部凹进,挑棚嵌入其中,两侧为两根圆柱,柱与梁板的接合处作了类似榫接的效果,显得比较轻盈而富有变化。

凹入面有圆拱窗一面,饰以彩色玻璃,位于挑棚之上。凹入面两侧墙面与侧立面墙体呈弧形转接,形体浑厚而又充满动感,这是永光堂出众的原因所在。上部山墙中央为三角形,尖顶处立红色十字架一副,上部山墙与侧立面墙体也是弧形转接,上下统一。正立面两侧从上至下各有四扇矩形窗,上部从左到右有四扇矩形窗,此例适中又有大小变化。

设计师学习了外国一些现代教堂建筑中用采光照明的手法,烘托环境。永光堂门廊上下,十字架下端都安装了聚光灯,所以夜间效果也比较精彩。

永光堂并不是以大尺度的空间感和体量感取胜,也没有完全模仿西方教堂的式样,而是以比较谦和的面貌出现,比例和尺度都经过推敲而舒适宜人。造型上又沿用了质朴而自然的形象,所以既保持了教堂建筑的特别需要,又能给人们带来一种亲切感。

当然与之相对的,温州也有一批比较不尽如人意的教堂,可能因为工期或者是其他一

些原因,出现了不少雷同现象,在设计手法上“拿来主义”太多,给人有拼凑的感觉,并没有在设计观念上认识到,虽然教堂是一种特殊性功能建筑,但对形制外观环境等也要有所考虑,不能简单地死搬硬套。而且普遍体量过于巨大,失去了作为小教堂的自然美和亲切感。

2. 建筑师开始注重对精神场所的设计

教堂是信徒们信仰中与上帝交流的圣地、祈祷的场所,是信徒们精神支柱的物质体现。因此在设计过程中不能不把这些特殊的精神性功能元素考虑进去。

以汕头市蓬洲基督教堂设计为例。

首先从场地环境出发。地块四周是低矮的民居,而且地势低洼,相对比而言,教堂用地地势高而开阔,地块 1185 平方米,东、北面为石板小道,自然乡土气息浓郁。

设计人认为,地块在“幽静中透着神秘”。并因此产生了对教堂形象的概念,乡村式的布局灵活,具有合适的尺度感,外部形象特征性强,有浓烈的宗教气氛^①。

其次从平面功能和布局着手。讲堂为教堂主体,位于基地西北,两侧为配套用房。由此形成了教堂的前广场,这是非常精彩而且至关重要的地方,因为广场不仅提供了人流集散的场所,而且为驻足观赏提供了空间,这是中国很多教堂建筑设计忽略掉的地方,而这是西方教堂的一个精髓所在。

由于基地内消防车道的要求,首层宽度不适合讲堂尺寸,所以讲堂设在二至四层,双侧出挑。配套的附属用房包括育婴园、小餐厅、厨房、办公室、牧师宿舍、钟楼和消防水箱位于屋面层。

设计人强调教堂主体的对称性,利用门洞、楼梯、侧墙的半遮挡,调整主轴线和主入口轴线的水平偏差,突出轴线带来的庄严与神圣感,

同时注重室内外的通风和采光,以及楼座上信徒的真实视角和心理视角,创造一种清爽宜人,而又最贴近讲台听经颂诗的环境。

再次为立面设计。设计人要体现——努力地体现——这是一个乡村小教堂,所以看重的是体积的组合而不是体积的雄伟性。正立面上的尖券窗、廊、逐层凹进的尖券门廊饰条,三角形的山墙、钟楼、扶壁上的高直尖券条窗,每一种元素都很精致,而且富有韵律,使得建筑显得很轻巧,很自然化,削减了砖红色墙面的重量感,又与周围民居形成了统一。

这一些教堂常用镂空手法,明媚阳光洒向室内讲堂,形成了丰富的光影变化,柔和而绚丽。

甚至连教堂的围墙大门也是由两片展开的镂空门墙组成,犹如两支直立的蜡烛。透过这两扇门看教堂,是一种引导,也是一种教化,它用一种神秘的宗教气氛,完美而和谐地展示出乡村基督教堂的形象。

3. 基督教堂形制设计带来的一些问题

事情是由于南京江苏路教堂而引起的。单从教堂建筑上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比较

^① 参见:蔡伟平,汕头市蓬洲基督教堂建筑设计浅析,中外建筑,2001年第4期,16页

中规中矩的方案,尺度、比例推敲得都比较细致。从细部来说,长条直窗与三角架式屋顶也比较圆满地表达了教堂的形象(图 15)。

问题出在它顶上的三个十字架上。江苏路堂是基督教教堂,教堂只立有一个十字架。如今新建的教堂有三个塔顶,一大两小,上面耸立着三个不锈钢的十字架,究竟设计人是受到某些天主教堂,或者是东正教堂的影响,还是出于突出宗教建筑氛围的美学考虑才这样设计的,我们不得而知。结果,业主与设计人一段时间不能达成共识,最后那三个十字架倒也一直保留下来。

随着愈来愈多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教堂建筑设计或许也会更多地放在我们设计师的案头上。建筑设计师们如何让此类精神性建筑的设计既保持其特有的形象魅力,又能与我们的城市自然环境,周边建筑和谐的融合为一个整体,还是有许多事情可做的。



图 15 南京江苏路教堂(1999 年使用)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参 考 文 献

- [1]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 [2] 吴泽主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3] ED ward J.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 [4]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
- [5] 张星娘编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1928 年
- [6] 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 3 卷
- [7] 余桂元,中国的著名寺庙与教堂,商务印书馆,1991
- [8] 唐逸主编,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9] 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上海三联书店,1990
- [10] 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1930
- [11] W. C. White. Chinese Jews. 1996
- [12] 荆其敏等,天津的建筑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
- [13] 陈从周,章明主编,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上海三联书店,1988
- [14] 卢海鸣,杨新华主编,南京民国建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教堂建筑述略

作者: [徐好好](#)
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5916979.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8947a0c0-ba61-4c03-b505-9e4d00f32134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